

# 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

杜 正 勝

「輕重」原義是貨幣，由於五穀也具有交易功能，故廣義的輕重亦包括之。操縱貨幣和糧食以謀取財富的手段謂之「輕重術」，從事這種作業的人古書稱為「輕重家」。本文認為輕重是戰國社會經濟史非常重要的課題，輕重術是當時最主要的經商手段，輕重家是當時最有勢力的商人。

關於戰國的輕重商人目前尚缺乏足夠的直接資料，《越絕書》和《管子》的輕重說雖然都從政府立場立言，但它們都以民間商人為其打擊對象，籌謀對策，故亦可據以檢討輕重商人。本文五章除序與結語外，第二章「范蠡計然與商賈輕重術」，分析〈計倪內經〉、〈枕中〉、〈貨殖列傳〉以至《史記·天官書》和《淮南子·天文訓》的歲星占年法，建構其由簡單到複雜的發展過程，作者以為歲星占年之術在范蠡時已具基本規模，到白圭而大抵完備。商人利用星占知識，預測年成，買賣物品，以謀厚利。第三章「《管子·輕重》的理論與政策」，討論今存十六篇所述壟斷物資的理論。輕重家主張政府挾其政治威權和政令的方便，利用市場經濟物多則賤、物少則貴的原理，調節五穀和貨幣的進出，政府便可以壟斷萬物與財貨。《越絕書》尚有政府平糶物價的用意，《輕重》諸篇直把政府變成壟斷的大商人。

戰國前期輕重商人買賣的物資以農作衣食產品為大宗，中期以下加入鹽鐵，本文第四章乃論這兩種新時代的致富企業。本文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說明鹽鐵之進入歷史舞台，再從山林川澤利用的傳統闡述鹽鐵的經營自始即官私並存。最後敘述《管子》鹽鐵附加稅的主張，與桑弘羊國營的意見截然不同。

不論衣食農產品或鹽鐵，都是齊民的民生必需物質，故輕重商人所取都是編戶齊民之利，他們既擁有絕大財富，變成社會豪強，役使平民，是集權政府主要的打擊對象。

## 一、序

封建城邦時代個人的財富享有是按身分階級而有等差的，也就是以政治為綱領，來分配經濟利益。禮書所述外服諸侯五等爵，內服公卿大夫士之封地、采邑及衣食住行的各種排場，都與此理念互相配合。對於禮所不下的庶人，財富分配則力求均等，井田制度一夫百畝的設計，或者按上、中、下三等田地而分別授予百五十、二百與三百畝（《周禮·遂人》），皆應均平的需求。在那個貴即是富的時代，工商活動乃封建政治的附屬品，沒有獨立地位；政治秩序未變，其附生的財富分配是可能穩定地存在的。

但自春秋以來，商業貿易逐漸活躍，尤其中晚期之後，社會上慢慢形成一個新富階級。他們與封建貴族的政治控制不同，藉經濟方式謀取利益，而享有與貴族相似的資源。西元前六世紀中葉，晉大夫叔向已感慨「絳之富商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國語·晉語八》）。這種富商即是戰國新富的先聲。

西周初期殷商遺民已「肇牽車牛遠服賈」（《尚書·酒誥》），春秋時代也有少數的國際貿易商人記入封建貴族的史冊（杜正勝 1988a），長程貿易應早已存在，但所販賣的物資並無明確記載<sup>1</sup>。西元前637年晉公子重耳答謝楚成王之禮遇說：「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九十年後楚大夫聲子使晉返國，亦對令尹子木說：「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從這兩則記言來看，封建時代國際貿易的主要內容大概不外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之類，都是封建貴族製造身分表徵之禮器的原料。

然而春秋戰國之際新興商人則與封建時代極不相同，他們經營的大宗貿易物資以五穀、絲帛、食鹽和鐵器為主，都是編戶齊民生活的必需品。他們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是商業的，一是工業的，前者販賣糧食衣料等農產品，後者販賣鹽鐵等工業加工產品。其經營方式，前者販有易無，後者兼營礦場、作坊與貿易。以今日的概念來說，後者兼具工商業，一貫經營，製造與販賣同屬一個主人。《史記·貨殖列傳》縷述戰國秦漢的貨殖大家，最先登上歷史舞臺的是從事農產品貿易的大商人，稍後才是鹽鐵商人，這可反映古代社會自封建制轉為郡縣制的過程中財富重新分配的現象。

貿易商人主要的經營手段是販有易無，以低價格購進大宗物品，再乘價格高時售

1 《左傳》記載兩位國際貿易商人，一是鄭國的弦高。僖公三十三年云，秦師襲鄭，「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杜預《注》：「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孔穎達《疏》所謂「遺人之物必以輕先重後」也。弦高做何買賣，《左傳》未言；《呂氏春秋·悔過》也只說「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膳以十二牛」，與《左傳》同。以上是先秦的傳述，但到漢代就有所增益了，《淮南子》曰：「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云云，「販牛」為舊說所無。從今日的新鄭到洛陽，路途歧嶇遙遠，趕牛販賣，頗不合情理，可是卻為司馬遷所採用。《史記·秦本紀》曰：「鄭販賈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則弦高不但是牛販，千里迢迢，所有的貨物也只區區十二頭牛而已。如此局面豈能矯命充當國家使節乎？《鹽鐵論·通有》曰：「弦高飯牛於周，五穀貨車入秦。」古代商賈驅牛車以載物，「飯牛」、「貨車」同義，皆指貿易而言，校釋者不達，竟據《史記》《淮南子》改「飯」為「販」（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引洪頤煊說），誤矣。另一位國際貿易商亦鄭國人，名氏不傳。西元前579年晉楚鄆之戰，晉荀偃被俘，羈留於楚將近十年，後來有位鄭國商人販賣於楚，準備偷渡他出境。《左傳》成公三年曰：「鄭賈人有將賓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褚，《左傳》注疏皆不言為何物，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十八「賓諸褚中」條考證的結論是布囊，與哀公六年《公羊傳》陳乞以巨囊載公子陽生事相類。則這位商人貿易的物品亦與弦高一樣，史無明文。

出，戰國時代稱作「輕重家」。《管子》〈乘馬數〉曰「輕重之家相奪」，〈山至數〉曰「輕重之家復游其間」，〈輕重甲〉亦云：「以令輕重之家」，這些「輕重之家」皆指以重射輕、販有易無的貿易商人。

輕重的本義大概指貨幣。《國語·周語下》云，周景王二十一年鑄大錢，單穆公諫曰：

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輕」顯然指小錢，「重」指大錢。以戰國貨幣來說，早期明定幣值仍不普遍，當時使用恐怕還是要以秤來衡量的<sup>2</sup>，貨幣名曰「輕重」，蓋肇因於此，後來漢唐史傳注疏之家遂多解釋「輕重」作錢幣。司馬貞《史記索隱》〈齊太公世家〉、〈管晏列傳〉都說過「輕重謂錢也」。張守節《史記正義》〈貨殖列傳〉亦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太史公說他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管晏列傳〉），司馬貞曰：「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把「輕重」與「九府」連讀，輕重之為貨幣是很明確的。

然而「輕重」還有更廣泛的意義。《史記·平準書》說「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重輕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漢書·食貨志下》引用《管子·國蓄》論五穀的散歛來解釋〈平準書〉「通輕重之權」的道理，也就是囤

2 朱活《古錢新探》著錄戰國時代各種錢幣，不論布或刀，注明重量的錢文並不多，一般只鑄地名而已，朱活並且認為平首布錢的「釡」字是布錢的名稱，不是標識幣材的實際內容（頁51），所以連少數注明重量文字的貨幣其實亦與重量無關。考古發掘一地同出之錢幣不但刀布並存，式樣不同，製造地往往包含幾十處（王世民〈東周時期金屬鑄幣的發現〉），可見當時各種貨幣的重量不等，代表的幣值不一，卻可以互相流通。流通的方法恐怕要靠秤來準衡價值，不同產地貨幣之競爭也許取決於其成色。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幣通考》曰：「鏹刀以銅製者，大小輕重不等，價雖不等，權其銅重，計價折合。迨鑄為幣，制復相因，所不同者，真器笨重，銅幣輕便，器重無定，須隨時秤量，幣重有定，不須再秤。其以銅之輕重為價格之標準則一也。久而各地並鑄，重量難齊，或偷減銅重，以少為多，鑄者乃於幣上明署銅重，使易辨別」（頁257-259）。如王氏所說在真刀真布之後，幣文注明重量之前，作為貨幣的刀布是不必秤量就可等價交換的。然而不僅刀幣布幣形制不一，同一種貨幣重量亦頗懸殊，恐難折價。所謂「幣重有定，不須再秤」，前提是要重量一定，齊雖有圓形方孔的「臚化」，重十二銖（王獻唐前引書，頁7-9），《漢書·食貨志下》所說「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當指此而言，但已在戰國晚期了。

積糧食，「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管子·國蓄》），或「輕則見泄，重則見射」（《管子·乘馬數》）的經商術。《鹽鐵論》的〈輕重〉篇引述桑弘羊，則專門發揮「徼山海之業」，講「總一鹽鐵，通山川之利而萬物殖」。所以輕重術在「耕桑農業」之外還包括鹽鐵，都是利用「物多則賤、少則貴」的原則牟取高額利潤的方法。

古人相信，個人的才智能力差別不大，有的人能累積大量財富，多半是利用經濟優勢剝削別人生產的結果，謂之「并兼」。輕重即是并兼的手段。輕重商人以經濟優勢取得崇高的社會地位，走由富而貴的路子，和封建貴族之因貴而富者雖反其道而行，卻收異曲同工之妙，只是缺乏政治身分的標籤而已。就政治意義而言，經濟的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地位是平等的，都屬於「齊民」，但就社會意義論，他們卻是不齊的。誠如《商君書·錯法》說的：「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同實而相并兼者，強弱之謂也。」經濟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它剝削壓榨人於無形，統御方式卻頗合乎「人情」。於是「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連太史公也不得不承認這是「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列傳》）。

并兼的結果，同列的齊民社會於是少數人有餘，而多數人不足。如何平衡有餘和不足的差異，便成為戰國時代主政者的一大課題。《管子·輕重》諸篇是研討這問題的基本文獻。〈國蓄〉篇說：人君要「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併財利而調民事」，則不能「以為治」。有餘與不足之懸殊並沒有隨著列國的統一而結束，反而愈演愈烈，直到漢昭帝年間的鹽鐵辯論，如何克服「聚不足」還是朝野關心的大問題（《鹽鐵論·散不足論》）。

關於戰國輕重術與輕重商人除《史記·貨殖列傳》外，基本資料保留在《越絕書》〈計倪內經〉和〈枕中〉兩篇以及《管子·輕重》十九篇（亡佚三篇），這兩批文獻的真偽與年代頗具有爭議性，這裡不能不先有所說明。

《越絕書》的計倪，或即《史記》的計然，亦即是《吳越春秋》的計碗（〈句踐陰謀外傳〉），古來就有書名或人名之爭，至今尚懸而未決<sup>3</sup>。說成書名，蓋指范蠡

3 《史記·貨殖列傳》云：「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云云」。從文句上無法斷定「計然」是與范蠡並列之人或是范蠡所著之書。《越絕書·計倪內經》云「句踐既得反國，欲陰謀吳，乃召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云云，當為人名無疑。《漢書·古今人表》有計然，列在第四等。《史記集解》和《索隱》引證徐廣、韋昭以及裴駰、司馬貞自案也都認為計然是與范蠡並世的人，司馬貞並否定蔡謨「蠡所著書」的看法。可見比較早的意見傾向於人名。書名之說至晚近乃為人所掄揚，以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年考辨》為代表（卷二、第三十四條），



的著作；說成人名，則是范蠡的老師。《越絕書》這兩篇的主旨與〈貨殖列傳〉基本相通，在我們沒有獲得明確證據之前，太史公把它們放在范蠡的時代是不宜輕易否定的。〈計倪內經〉的主角是計倪，〈枕中〉主角則為范子，我們姑且取其表示范蠡時代的見解，對書或人的爭議暫時存而不論，尚不至於妨礙我們所要進行的社會經濟分析。雖然《越絕書》到東漢初年才結集成書，但其內容與〈貨殖列傳〉相近，似應屬於先漢的作品<sup>4</sup>。《吳越春秋》也是晚出之書，〈句踐陰謀外傳〉引述數言較之《越絕書》簡略，然大旨不背，亦可互相發明。

《管子·輕重》篇討論的人更多，對其著成年代意見紛歧，莫衷一是，近人多半抱持懷疑的態度，而將這些論文的寫作年代移後。譬如郭沫若認為是西漢文、景時同一學派的文匯（郭沫若 1956，頁23），羅根澤斷作武昭時理財學家所作（羅根澤 1931，頁122），馬非百更推遲到王莽時代（馬非百 1956、1979）。相對的，也有少數人主張《輕重》諸篇是戰國之著作，他們分別對西漢說（尤其是馬氏之論）提出駁正（容肇祖 1958；胡家聰 1981）。這些論辯我曾撰文評議，並據《輕重》諸篇無意流露的歷史制度證明它們是齊國的作品，可以早到戰國中期（杜正勝 1988b）。其實《輕重》觸及的貴粟、鹽鐵和均輸等重大問題，雖與西漢人無異，提出的對策卻大相徑庭，這是戰國社會經濟史的一大寶庫，我們拈出「輕重」以論當時的兼并現

胡寄窗從之（《中國經濟思想史》上，頁189—190）。這派立論的理由雖然不少，真正持之有固者還是蔡謨的質疑。范蠡既說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是功重於范蠡，而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實不合理（引自《繫年考辨》，頁103）。唯從人名說之立場來考慮，〈貨殖列傳〉徵引「計然曰」那一大段文字，並非完全「不述」也。根據《越絕書》和《吳越春秋》所記，計倪乃一獻策之士，無甚事蹟，太史公不為立傳，亦非不合理。不過，書名說還有兩條東漢的證據，比較有力。胡寄窗引王充《論衡·明雩》云：「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于）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就行文慣例，「計然」可以是書名。另外一條見於今本〈越絕篇敘外傳記〉，「其范蠡行爲，持危救傾也，莫如循道順天，富邦安民，故次《計倪》」。這是袁康的敘傳，可以代表他的意見。袁康以「計倪」斷然是書名，唯與篇中敘事不甚吻合，所以還無法有最後的結論。

- 4 《越絕書》舊題端木賜撰，惟因末篇〈敘傳〉云：「句踐以來至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知成書於東漢初年。〈敘傳〉又曰：「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四句字迷，射「袁康」二字。「禹來東征，死葬其疆（疆）」，表示會稽人。「文屬辭定，自于邦賢；邦賢以口爲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潤色者乃同郡吳平，也是猜字遊戲。所以歷來諸家多以爲《越絕書》是袁康所作（《僞書通考》頁638—640）。但〈敘傳〉明云「記陳厥說，略其有人」，錢培名《校識》乃疑袁、吳非《越絕》之原作者，而從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蓋戰國人所爲，而漢人附益之」。其實比較袁康〈敘傳〉與今本日次，漢本《越絕》篇次、篇目和今本有甚大的出入，今本恐亦非袁吳結集之舊貌。有些篇章顯然是漢代的作品，如〈記吳地傳第三〉多言漢事，〈春申君第十七〉「讀書通一經」，是漢人語，非戰國之言。但像〈計倪內經〉所論，與〈貨殖列傳〉、〈天官書〉相近，而如本文注6（頁490）所言，有些地方顯示〈貨殖列傳〉抄錄〈計倪內經〉，顧頡剛歸爲先漢之作（間引自胡寄窗 1962，頁190），應是合理的。

象，也可以為董仲舒批判西漢前期兼并所謂「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上》）的話找到根源。

## 二、范蠡計然與商賈輕重術

新興商人以販賣農產品登上歷史舞台，時間大概在春秋戰國之際，像《史記·貨殖列傳》所載的富商范蠡、子貢和白圭三家，都屬於戰國中期以前，當然不意味中期以後沒有這類商人，只不過表示因此而致富是戰國前期的絕大特色罷了。他們泄輕射重，販有易無，在買賣之間謀取厚利。由於農產品貿易和年成好壞息息相關，商人於是憑藉一種特殊的占星知識預測收成，以便囤積或出售。然而輕重商人這種經營方式是始發於民間，還是如《貨殖列傳》所說，首先為越國的財經政策，後隨范蠡推廣到商人階層，目前尚缺乏絕對證據。本文暫從《史記》，也肯定范蠡的記載，認為輕重術在春秋戰國之際已經萌芽。

### （一）歲星占年

根據《國語·越語下》，范蠡通曉天文星占，且用之於政治軍事。《越語下》云，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諫曰：「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後來范蠡又謂越王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所謂贏縮，《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史記·天官書》則專指歲星，曰：「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贏縮為常之常，按長沙子彈庫楚帛書即「當」之意（饒宗頤 1985，頁37）。范蠡認為戰爭之發動與否當觀察星象，尤其是歲星。那麼，《越絕書·計倪內經》詳述那位可能是范蠡之師的計倪為越王句踐籌措糧食的方法，其基礎藉助於歲星占星術的知識，大概是有所本的。

歲星即太陽系九大行星的木星，中國人很早就注意觀測它運行的軌跡。陝西臨潼新出的利簋銘文有「歲貞」二字，有人釋作祭祀歲星，貞問成敗（于省吾 1977、徐中舒 1980），《尚書·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可能是祭祀歲星。據說武王伐殷，歲在鶉火（《國語·周語下》），晉之始封，歲在大火（《國語·晉語

四》），用歲星走到大火心星的位置標識年代。我們現在雖不能肯定這是記實，但《左傳》、《國語》也經常有以歲星紀年的記載，歲星紀年法大概在春秋時代就已通行，唯尚屬初期，文獻紀年資料與實際天象差距仍達三次之多，到戰國早期（約400 B.C. - 360 B.C.）紀年資料與歲星實際位置才相符合（陳久金 1978）。從粗疏而精密乃科學知識發展的正常過程，人民既早知歲星，在范蠡時代有人利用歲星占測人世現象是很可能的。《史記·天官書·正義》引《天官占》曰：「歲星農官，主五穀。」木星運轉和五穀收成關係的建立，目前雖難溯源，從范蠡計然的故事看，可能不會晚於春秋末年。

《計倪內經》和《貨殖列傳》都講到以歲星運行占測年成豐歉的方法，其中可以分出簡易和複雜的兩套系統。簡易的系統是「別陰陽之明」。木星環繞太陽運行一周，大約等於十二個地球年，此十二之數與地支配合，故用子丑表示歲星所在的位置。十二年分為陰陽兩部分，六年陽，六年陰。《計倪內經》曰：

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

歲星之神靈曰歲陰，亦稱太歲或太陰（陳遵媯 1982，頁411）。《史記·天官書》說，歲陰左行，歲星右轉，背道而馳，十二年再回到相對的位置。歲陰左行，從寅至未即包含寅、卯、辰、巳、午、未六支，屬於陽；同時歲星右行，丑、子、亥、戌、酉、申六支屬陰，這樣的年頭收成「美」。如果歲陰行於丑至申的陰位，而歲星行於寅至未的陽位，收成則「惡」，故曰「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貨殖列傳》云「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意思相同。康，虛荒也。《計倪內經》之「康」，《貨殖列傳》皆作「饑」，意近<sup>5</sup>。因為十二年內分作陰陽，農作物的收成美惡相對，故曰「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淮南子·天文訓》、《史記·天官書》）。當然後來歲星占星術的發展日益精細，陰陽分判就不會刻板地以六年作一個單位了。

另外比較複雜的方法是「審金木水火」之五行。這裡五行不含土，只有四行，恐怕是配合四方方位的術語，與五大元素的五行不相干。《計倪內經》說，炎帝有天下

5 《計倪內經》云：「六歲一康」，《貨殖列傳》作「六歲旱」；《計倪內經》云：「三歲聚木則康」，《貨殖列傳》與《天官書》皆作「木，饑」。康或作「冑」。《周書·謚法》曰：「凶年無穀曰冑」。《穀梁傳》襄公二十四年：「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注》：「康，虛。」《疏》：「虛荒之名」。因為康有空虛之義，如《詩·賓之初筵》「酌彼康爵」，《爾雅·釋器》云「康瓠謂之甌」。

以傳黃帝，黃帝上事天，下治地，而傳少昊治西方，主金；玄冥治北方，主水；大昊治東方，主木；祝融治南方，主火；后土治中央，主土。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五星占》也說：東方木，西方金，南方火，中央土，北方水（《中國天文學史文集》頁1—2），〈計倪內經〉接著說：

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

可見這裡的金、水、木、火即是西、北、東、南四方的代名詞。〈貨殖列傳〉亦云：「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天官書〉同。《史記索隱》曰：「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貨殖列傳〉），恐怕是誤解。因為五行也有方位，中央土，其他四行配四方，歲星在天上雖無地面方位可言，但星象家也將一周天分作四區，再規劃十二支的位置。居於中央的土在木星運行軌道上，無法安排適當位置。其餘四行，金屬西，佔申酉戌三支之位；水屬北，佔亥子丑；木屬東，佔寅卯辰；火屬南，佔巳午未（《淮南子·天文訓》、伊世同 1981，〈說明〉）。各依太陰之所在占測收成之豐歉美惡。《淮南子·天文訓》亦曰：「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從六歲一變的「別陰陽之明」到三歲一轉的「審金木水火」，似乎顯示占星術的精密化，大概到春秋戰國之際，發展到此階段，范蠡當熟習於此道。

白圭時代的占星術預測範圍仍以三年為一單位，但不像范蠡時之機械式地三歲穰三歲旱，而在三年內亦有豐歉變化。占星知識比起以前更加精進。〈貨殖列傳〉記載他所運用的歲星占年法曰：

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卯、午、酉、子，皆隔三年。太陰在卯之歲，豐收，明年在辰，略差；再過兩年，太陰在午，旱，明年在未，又豐收，依次起伏循環。太史公序列白圭於魏文侯（445 B.C.—396 B.C.）時，當戰國前期，與《戰國策》及子書所載白圭事蹟不符，梁玉繩《漢書人表攷》乃疑戰國前後兩白圭，一當魏文侯時，一值魏惠王。錢穆《先秦諸子繫年考辨》則推斷白圭只有一人，活動時代大概在戰國中期（頁251）。以太歲占星術的發展看，錢說可從。

《史記·天官書》還以歲星出現其位之早晚推斷當年的水旱，凡有水旱當然也會

影響作物的收成；《淮南子·天文訓》更精密地分別各種農作的美惡，茲合二書，列表如下：

歲星紀年	歲陰位	歲星位	歲生出現		農作					民食 (升)	其他
			早	晚	稻	禾	蠶	菽	麥		
攝提格	寅	丑	水	旱	疾	不登		昌		四	
單閼	卯	子	大水		昌		昌	昌		五	
執徐	辰	亥	旱	水			閉		熱	三	小饑
大荒駱	巳	戌					小登	疾	昌	二	小兵
敦牂	午	酉	旱	水	疾	不爲	登	昌		二	
叶洽	未	申			昌		登	不爲		三	小兵
涒灘	申	未					登	昌		三	小雨
作鄂	酉	午	旱		熟	蟲	不	不爲		五	大兵、民疾
闕茂	戌	巳	水				不登	昌	不爲	七	小饑、有兵、水
大淵	亥	辰				蟲	開	不爲		三	大兵、大饑
困敦	子	卯	大水		昌		昌		昌	三斗 (升?)	
赤奮若	丑	寅	水		疾		不出	不爲	昌	一	小兵

歲星出現太早或太晚則有水旱，〈天官書〉的記錄只有攝提格、執徐、敦牂三年，其餘單閼云大水，闕茂云水；〈天文訓〉的記錄攝提格、執徐與〈天官書〉同，而涒灘云小雨行、困敦云大水，赤奮若歲星早出則水。這些資料大概說歲星運行未按時出現在適當的位置（「失次」），則風雨不調順。但十二年周期只三年有歲星出現早晚的影響，五年籠統言水旱，可能只是占測年成的輔助性知識，逐漸衍義充實，並不能取代陰陽、五行或三歲美惡的系統。胡寄窗把這些系統及輔助知識完全歸作范蠡時代的產物（胡寄窗 1962，頁178），恐怕是錯誤的。

## （二）占星術與輕重術

隨著歲星所在而年成有美惡，上文說過歲陰左行，歲星右轉，一周天規劃十二支的位置，同年之內二者是相對的。早先陰陽二分，「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



，歲乃有殃」（〈天官書〉）的原則，後來更加細密化，農作收成的美惡也不一致。〈天文訓〉將農作物分爲稻、禾、蠶、菽、麥五種，同歲各有疾昌。再加上戰亂、饑荒之預測與民食的多寡，各種因素配合考慮，運用占星術從事貨物的買進賣出以俾厚利的方法就逐漸專業化、複雜化了。

歲星影響年成，自然關係到物價，《越絕書·枕中》云「八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是也。三表者，〈枕中〉曰：

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稱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者也。

和上引〈計倪內經〉一樣，五行缺土，而金木水火與五行相生、相剋之通說亦不盡符合，應該也是表示歲星所在方位的意思。基本含義在求陰陽二氣的盛衰，與〈計倪內經〉所謂「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的道理相通。所以〈枕中〉說：「其明也諦審，察陰陽消息，觀市之反覆，雌雄之相逐，天道乃畢。」雌雄即是陰陽。

陰陽消息反映於四時的秩序上。〈枕中〉說，冬三月陽氣避之下藏，夏三月陰氣避之下藏，然後萬物親而信之，若夏月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冬月地不內藏則根莖不成，來春無生。又說：「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不寒者，穀爲之暴貴；當溫而不溫者，穀爲之暴賤」；當「陰陽俱會」時，則「八穀大成，其歲大賤，來年大饑」。因爲陽氣主生，陰氣主殺，「死凌王（生）者逆，〔八穀〕大貴；生凌死者順，〔八穀〕大賤」，此之謂「八穀貴賤相勝」。〈枕中〉云此陰陽消息關係天門地戶，其說雖不可盡曉，但當與天象術數有關，不止是氣候溫寒而已。

上文所述歲星占年系統雖有繁簡之分，但美惡相間，豐歉交替的基本原則是不變的。〈枕中〉所說陰陽變化，八穀貴賤相勝的道理，基本上也是一貴一賤的模式。所以〈計倪內經〉云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陰陽之義與〈枕中〉所述同，「察陰陽消息」而可以「觀市之反覆」，星占便成爲積歛或散發貨物的憑藉，〈計倪內經〉據此以論政府財經社會政策曰：

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歛貨財，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

收者積斂，發者散放。太陰在寅至未的陽位，歲美，相反的，在申至丑的陰位則歲惡，人民收成不好，政府應該散發積存的糧食。等太陰行至丑，陰且盡，將進入陽位豐收之年，政府要趕緊出賣六畜貨財以收購民間餘糧。同樣，當太陰行至未，陽且盡，將轉入陰位歉收時，政府趕快發放貯存的糧食，而收買田宅牛馬、貨物。《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外傳》曰：「仰觀天文，集察緯宿，曆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望陽出糶籩」，也是觀察歲星之陰位陽位而收、發五穀、財物的政策。

這種主張以市場經濟為前提，政府並且壟斷大部分的民生物資；唯怕供需失調，物價抑揚太甚，由政府出來調濟，以舒民困。既然站在政府的立場，不論農商，無所偏袒，皆宜照拂，〈計倪內經〉故曰：

糶，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糶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

政府收購五穀，平均一石二十錢，是極賤之價，市場價格亦自然壓低，農民無利可圖，於是廢耕。相反的，如果以一石平均九十錢之高價收購，市場價格昂揚，但紛紛流入政府手中，又會打擊到商人，商困則貨物反而不流通。所以穀價一般訂在一石八十至三十錢之間，農商才俱蒙其利。五穀貴賤不一，每石價格只是大略的估計，該篇說甲貨曰粢，乙貨曰黍，丙貨曰赤豆，丁貨曰稻、粟，戊貨曰麥，己貨曰大豆。從甲貨石七十錢，每差一等遞減十錢，以至石二十錢。庚貨的穰和辛貨的菓無價，比照疏食，總曰「八貨」，亦曰「八穀」，五穀價格即在上述的原則內。政府若真能勵行調節政策，自然「衆人容容，盡欲官貴」。這樣，〈貨殖列傳〉謂之「平糶（糶）」<sup>6</sup>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

〈計倪內經〉的「制其收發」即是「平糶」政策，由於站在超乎農商利益的立場，而以全民為考慮，〈貨殖列傳〉故曰「無敢居貴」。物價之貴賤隨物資之多寡而浮動，「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是自然之理。但政府既負有調節物價以濟民生的責任，便不能受市場經濟擺布，反而要堅守違背市場經濟的原則，「貴出如糞土

6 〈計倪內經〉的糶，〈貨殖列傳〉作「糶」，其餘文字皆同。但一字之差，意義非凡。〈計倪內經〉乃超乎農商而以全民為考慮的政策，糶者政府之糶，按照本文正文的解釋，「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皆能通達。如果是糶，政府以一石二十錢之賤價賣出五穀給農民，怎能說病農呢？以一石九十錢之貴價出賣五穀給農民，商人也隨著水漲船高，如何說病末呢？這裡一字之差可以證明是《史記》抄〈計倪內經〉，絕非〈計倪內經〉抄《史記》。此亦我們相信〈計倪內經〉為先秦著作的一項證據。

，賤取如珠玉」（〈貨殖列傳〉）。也就是當物質缺乏、價格昂貴時，政府要散發積存，以如糞土般的低賤價格出售；而物資豐富、價格低廉時，政府要以珠玉般的高價收斂市面過剩貨物。政府的政策是物賤則賣，物貴則買，司馬貞《索隱》卻講成商人賤買貴賣的貨殖行為，實不了解范蠡計然之論<sup>7</sup>。政府既然干與，於是乎沒有腐敗廢棄的餘物，也不會有停滯不流的貨幣，〈貨殖列傳〉謂之「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這是「積著」的最高境界。有人以為「積著」是囤積居奇，胡寄窗矯正這種草率的意見，是可取的；但他提出「待乏」之論，說范蠡的政策預為收儲以待時機（胡寄窗 1962，頁183），也和司馬貞犯同樣的誤解。

然而平抑物價以裕民生的國家財經政策轉入商人手中，內容、方法雖舊，意義與功能則彌新。太史公說，范蠡既雪會稽之恥，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於是棄官浮海適齊，之陶從商，

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債）於人（〈貨殖列傳〉）。

（越王句踐世家）亦曰：

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

「積居」，〈貨殖列傳〉引計然曰作「積著」。廢居，〈貨殖列傳〉別述子貢經商曰「廢著」，〈仲尼弟子列傳〉作「廢舉」，意思皆相近。廢，疑當讀作「發」，指出賣；居、著、舉，皆貯積之意<sup>8</sup>。單從字面意義看，「廢居」分別指發賣與收買，「積居」專指收藏，不過「計然之策」講究的是「收發」，有買有賣，史公所言必兼含二義。

商賈在一買一賣之間，「乘時射利」（《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徐廣曰）。「

7 《史記索隱》闡釋這段「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的文字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為貨殖也。元注恐錯。」當貴極而未賤時，趕快賣出，如守市場原則，當是貴賣，怎會說「如糞土」？如不守市場原則而賤賣，和賤價才賣有何不同，何必乘時而出之？賤取如珠玉亦同理。司馬貞從商人立場來解釋，他忘了這段引「計然曰」，是政府的平糶政策，不是商人「貨殖」。張守節《正義》曰：「夫物貴出賣之，而收財買，言如糞土不惜也。物賤而買居貯之，言如珠玉必惜也。」只就字面鋪陳，無所助益。《索隱》、《正義》皆不足取，唯司馬貞所提的「元注」不知何指，今本《史記》未見，當與他的說法不同，但也無從參證了。

8 《史記·平準書·集解》引徐廣曰：「廢居者，貯蓄（蓄）之名也，有所廢，有所蓄（蓄）。」《索隱》引劉氏曰：「廢，出賣；居，停蓄也。」〈仲尼弟子列傳〉「廢舉」，舉同居，《索隱》引王肅曰：「謂賈賤賣貴也」；引劉氏曰：「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收買之。」舊解意義清晰，也非常一致，唯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從中井積德「廢，居也；舉，發也」之說，適得其反，轉生支離。

時」即天時，也就是上文所述，根據歲星占星術對於來年農作物收成的預測。占星術一般只能提供粗略的原則，事實變化多端，從事買賣的商人積貨要得時，出貨要適宜，才有利可圖，太史公乃用「與時逐」，「候時轉物」來形容范蠡的經商手段，用「與時轉貨貨」來描述子貢（〈仲尼弟子列傳〉），而稱「白圭樂觀時變」（〈貨殖列傳〉）。所以戰國前期的商業資本家，自范蠡以下，基本上是一脈相傳的，他們的經營方法則脫胎於「計然之策」。

與時追逐的買賣要能成功，必須善於掌握物產與地區兩大要素。物產方面，同一品類豐收之時，市場價格低廉，大量買入囤積，乘歉收之時出售以謀利；而不同品類物資的出入流通，運用妥當，也是致富之道。戰國時代他們轉賣的貨色主要是衣、食兩類民生用品，如〈貨殖列傳〉述白圭「歲孰（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視年成之豐歉，進出五穀或絲帛。《孝經內記》曰：「歲星生氣為青穰者，明日大寒小雨，見此者魚鹽大貴，不出三旬皆可再倍，貴不過二十日止；所見之國傷苗少實。天下有一歲十饑，見者不出其年，富民從（徙？）其故鄉，王者不安，大臣坐事；不出二年，天下無布，練貴縑絮四倍，萬民大寒」（《唐開元占經》卷二十三）。更由歲星占測魚鹽物價，禾苗成長及布帛縑絮。這是漢代或更晚的占書，比古代歲星占年更加發展。上面引述的《淮南子·天文訓》，同年內稻、禾、蠶、菽、麥之收穫多寡不一，而「天道自然，八穀亦一賤一貴」（《越絕書·枕中》），可以互相為用。至於地區，馬王堆漢墓出土《五星占》曰：歲星歲處一國，正月與營室晨出東方，名為攝提格，明年二月與東壁晨出東方，名為單閼，依次每年加三十日與胃、畢、東井、柳、張、軫、亢、心、斗、虛晨出于東方。所謂歲處一國，當指二十八宿的分野，〈天文訓〉謂之「星部地名」，即角、亢之鄭，氐、房、心之宋，尾、箕之燕，斗、牽牛之越，須女之吳，虛、危之齊，營室、東壁之衛，奎、婁之魯，胃、昂、畢之魏，觜、雋、參之趙，東井、輿鬼之秦，柳、七星、張之周，翼、軫之楚。〈天文訓〉說「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大概是指地上分野所在國家而言。如果換用干支，則「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商人無國界，利用占星術推測各地物產的豐歉，販有易無，比〈計倪內經〉單為一國政策設計者更靈活。他們在時變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故能處處佔先機，

在不同地區間轉賣貨物，增殖貨財。

觀察星象，推占年成，固靠預測；與時逐物，何者當買，何者當賣，也靠預測。孔子謂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億就是預測。孔子對子貢的評論歷來頗多異解<sup>9</sup>，皆不及王充平實雅正而符合於〈貨殖列傳〉。《論衡·知實》曰：「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俞樾《羣經平議》釋「不受命而貨殖」曰：「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什一之利」（卷三十一）。非官命之商賈，也就是私有的商人。他們借用計然的財經手段從事販有易無的貿易事業，但没有政府以整個國家作後盾的有利條件，臆測得中必須配合其他才能。白圭自述經商之術，「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生具之智足以權變，勇足以決斷，仁能以取予，彊能有所守。看得準、出手狠，所謂「趨時若猛獸擊鳥之發」，於是走在時變之前，不落人後。到戰國中期，歲星占術已比先前精密，而白圭可能也是范蠡、子貢以來將「候時轉物」之術發揮到極致而能說出其中訣竅的人，故「天下言治生，祖白圭」（〈貨殖列傳〉）。然而推溯他經商方法的本源則出自〈計倪內經〉「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的「時」「智」二字，知此二者，則「萬物之情，短長逆順，可觀而已」。在戰國末年，希寫謂趙國建信君曰：「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戰國策·趙三》）。《鹽鐵論·通有》文學批評「歲司羽鳩」致富者，當亦指「謹司時」的商人<sup>10</sup>。

范蠡、子貢、白圭「候時轉物」之術亦叫作輕重術，是戰國以下商賈累積財富的重要手段，故又可稱作輕重商人。輕重商人的積聚可以追溯到封建時代的老傳統。封建貴族往往儲藏穀糧，「千斯倉，萬斯箱」（《大雅·甫田》），「亦有高廩，萬億

9 《論語》何晏《集解》曰：「賜不受教令，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邢昺《疏》曰：「不受夫子禮教之命，唯務使貨財生殖蕃息，又用心億度人事之是非。」切割「億則屢中」，分屬別句，但還承認貿易經商；崔述則連這點也否定。《洙泗考信餘錄》曰：「古者金粟皆謂之貨，殖猶生也，所謂貨殖云者，不過留心於家人生產，酌盈劑虛，使不至困乏身，非糶賤販賣，若商賈所為也」（卷一）。他舉證孔子斥欲學稼圃的樊遲為小人，若子貢躬行商賈，聖人不知當如何斥之，所以〈貨殖列傳〉的記載乃「司馬氏憤激之言，不可以不辨」。崔氏「考信」方法每以他心目中的聖人之道為依據，此亦一端，不值得細辨。

10 《左傳·昭公十七年》曰：「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杜《注》：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伯勞（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鶉鴒（青鳥）以交春鳴立夏止，鶯雉（丹鳥）以立秋來立冬去。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通有〉之「羽鳩」蓋指司時之四鳥，亦參見王利器《鹽鐵論校注》。



及秭」(《周頌·豐年》);黍稷堆積,「其崇如墉,其比如櫛」(《周頌·良耜》)。人民一旦缺糧,採取借貸的方式以濟急,貸而不必還者便是德政,可以收買人心<sup>11</sup>。像〈計倪內經〉的收發政策,固為封建政權所未聞,而范蠡「不債於人」卻能致富的營生方式對封建貴族而言,也是嶄新的經驗。

春秋戰國之際新興的輕重商人不從事封建貴族的積聚,卻視時而「居」,乘時而「廢」。也就是說,他們的經營方式以儲存和出賣並重。市面某種物資豐盛,價格低廉,大量收購貯藏,對商人而言固能以少量金錢獲得大量貨物;但在市面流通的貨物既然減少,對生產者來說,也能維持一定的價格,不至於太滑落。相對的,當市面某種物資歉缺時,價格抬高,商人賣出貯藏之貨,固能謀取大利;由於物品得到補充,市面不那麼渴求,自然而然也會壓抑價格上揚的趨勢,對於消費大眾而言,也是有利的。這就是白圭「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貨殖列傳〉)的妙用,亦計然「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貨殖列傳〉)的遺意。

### 三、《管子·輕重》的理論與政策

輕重商人「與時逐」,「與時轉貨賁」和「樂觀時變」之「時」當不限於上述占星術的時。每年收成前夕,農家舊穀既盡,新穀未登,是青黃不接之時。向來耕耘百畝之田的小農戶,一般生活都接近臨界點,一旦水旱,便衣食不繼,非舉債無法度日,這是饑饉之時。戰國編戶齊民的賦役負擔沉重緊迫,人民應上之急,削價售物以求現款,這是急徵暴斂之時。富商蓄賈於是守「時」觀變,乘民之急,農民乃飽受政治

11 《左傳·文公十四年》曰:「子叔姬妃(配也)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殺舍。」齊公子商人施於國人,即以穀粟貸給國人,作為收攬民心的手段。因為國人屬於諸侯統轄,卿大夫不能施予恩惠,有野心者則多以借貸形式來掩飾。如宋公子鮑乘宋饑之時,「竭其粟而貸之」於民,祖母「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左傳·文公十六年》)。西元前544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貸而不書,實際即是施舍。即使是國君,一般也是貸的,並非無償給予。西元前564年晉楚爭取鄭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左傳·襄公九年》)。至於齊國田氏家量大於公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左傳·昭公三年》),也都脫離不了借貸的方式。又《國語·晉語八》,叔向謂欒桓子「驕泰奢侈,貪慾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賄」,故及於難。

性與經濟性的「雙重聚斂」之苦（杜正勝 1990，頁405）。

這種情況之下，政府應採取對策。《管子·七臣七主》曰：

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羨<sup>12</sup>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

青黃不接，年成歉收，急徵暴斂，小農的困厄很容易顯露出來；但豐年農民雖有餘糧，亦不見得可以過舒適的日子，真正能獲取百倍、十倍之利的是商賈，其中道理亦見於《管子·小問》。曰：「飄風暴雨，不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藏），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先事、先政，〈小問〉認為是牧民者的急務，也就是預防物產充斥市場而讓商人壓低價格，農民該得的利潤才能免於落入商賈之手。政府對過剩物資「厚收善藏」的措施叫做「振淫」或「調淫」。在自由市場的經濟狀態下，商人對於農人永遠居優勢，如果國家不干與，人口佔最大多數、而且是政府財稅與兵源之所出的小農必定貧困，國家便注定非衰弱滅亡不可。故《管子·七臣七主》曰：「夫亡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當時有一派士人針對這些現象，發掘問題，籌謀對策，他們的觀察和議論主要保存在《管子·輕重》諸篇。

#### （一）貨幣與五穀互為輕重

戰國時期「春秋」和「敗凶」之時會對齊民小農產生那麼大的壓榨作用，主要由於政令的「急緩」。《管子·輕重甲》曰：

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糴其五穀三分賈（價）而去。

為何政府徵集人民服役，人民不但提供勞力，還遭到經濟的剝削呢？因為戰國時期，不論兵、徭，出門服役都要自籌裝備。譬如雲夢睡虎地四號秦墓出土的兩件木牘（《雲夢睡虎地秦墓》頁25），是戰地士卒寫給親人的家書，要求家人趕快寄給他們金錢和絲帛衣物<sup>13</sup>。這是兵役方面。至於徭役，人民不但要自籌裝備，甚至還要自裹餼糧

12 羨，今本誤作「義」，此從王念孫、豬飼彥博說，見《管子集校》頁832。

13 睡虎地四號墓11號木牘寫信人叫作黑夫，書曰：「黑夫寄益就書曰：『遣黑夫錢，毋操夏衣來』。今書節（即）到，毋視安陸絲布賤，可以為褌裙襦者，毋必為之，令與錢偕來。其絲布貴

。《管子·山國軌》曰：「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籠、纍、箕、勝（勝）、簾、屑（筓）糗，……無賞之家皆假之。械器、勝（勝）、簾、屑（筓）糗、公衣，功已而歸公，衣（衍文）折券」<sup>14</sup>。政府貸給無賞之家勞動工具、衣服和乾糧，借貸既然登記在券，役畢歸還，若有損毀，照秦國的例子，亦須賠償<sup>15</sup>。無賞者向政府借貸，有賞之家亦須靠朋友濟助，如劉邦，秦時「常繇咸陽」（《史記·高祖本紀》），「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獨以五」（《史記·蕭相國世家》）。所送奉錢即為籌辦裝備及消費之用。睡虎地四號墓的兩件書信大概在秦王政統一中國前夕，而劉邦之赴咸陽服徭役在統一以後，時間雖然略晚，亦能反映戰國的制度或習慣。

《管子·山國軌》曰春夏秋冬四時，民皆有「功徭」。每次徭役，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

政府徵集，齊民迫切需要現金以佐行役，於是脫售糧食財物，上引〈輕重甲〉說，此時價格可能被迫壓低到正常的三分之一，積居時蓄之家乃藉機謀取厚利。「所以時守」、「所以相并兼」之民當指豪民富商。〈揆度〉篇說得更明白，曰：

今天下起兵加戰，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讎（售）。厭〔分〕<sup>16</sup>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

，徒〔以〕錢來，黑夫自以布此。」黑夫秦卒，此時「直佐淮陽，攻反城久」。淮陽屬楚，報告者疑即秦王政二十三年（西元前224）滅楚的戰爭。黑夫先與益就一信，請家人寄錢和夏衣來，接著在二月辛巳又寫此信，催促母親買絲布裁衣裙，與錢一同送來，若故鄉布貴，只寄錢，由他在當地買。黑夫提到一位惊，可能是他的兄弟，四號墓同出的6號木牘即是惊給衷的家書。木牘殘文有曰：「（上缺）錢衣，願母幸遣錢五、六百，倍布謹善者毋下二丈五尺。（缺）用垣柏錢矣，室弗遺，即死矣。急急急。」向母親要五、六百錢及二丈五尺好布。戰地危險，隨時有生命之憂，故請家人急速傾囊供給。見《雲夢睡虎地秦墓》頁25-26。

14 假借改字參見《管子集校》所引諸家說，頁1081~1082。

15 睡虎地秦簡《金布律》曰：「百姓段（假）公器及有責（債）來賞（償），其日以收責（債）之，而弗收責（債），其人死亡……令其官畜夫及吏主者代賞（償）之」（《睡虎地秦墓竹簡》頁60）。《工律》曰：「邦中之徭及公事官舍，其段（假）公，而有死亡者，亦令其徒、舍人任其段，如從興戍然」（《睡虎地秦墓竹簡》頁70）。又曰：「其或段（假）公器，歸之，久（記也）必乃受之。……其久靡不可智（知）者，令齎賞（償）。段器者，其事已及免，官輒收其段，弗亟收者有罪。其段者死亡，有罪毋責（償）也，吏代賞。毋擅段公器者，者（諸）擅段公器者有罪，毀傷公器及口者令賞（償）」（《睡虎地秦墓竹簡》頁72）。政府器物不可隨意借給人民，當只如邦徭、公事之類可以假借。損毀賠償，官吏負連帶責任。

16 今本無「分」字，《管子集校》郭沫若案，古本、劉本、朱東光本均作「厭分而去」。分猶半，謂滿半價而去。參看《集校》頁1166。

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策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誠如上文的引述，戰事一起，徵集之令朝發夕具，農民於是拋售財物五穀，換取金錢以治行裝。厭分即半價。鼂錯曰「急政（征）暴〔賦〕，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漢書·食貨志上》），即是這種情形。商賈利用「令之所發」，以少數貨幣獲得大量民生物資。等到戰爭結束，士卒解甲歸農，食之者衆，物價於是升高，商賈又乘「令之所止」，高價出售囤積的五穀財物，在市面上流通的貨幣約十分之五弱（少分）遂流入他們的囊中。市面貨幣供應量減少，錢乃重；而小民如出售財物，因為物多錢少，賣得的金錢當然少。由於錢重三分，物價之差亦三分。但對齊民小農而言，持有的貨幣不多，能藉幣重增強購買力的機會也有限，結果這三分之間的利潤自然為商賈所奪。〈輕重甲〉曰：「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渴也。」產物與貨幣一進一出間的操縱，齊民小農重貧重渴，國之財物盡在賈人，他們便無法逃出積餘藏羨之家的掌心。

自春秋中晚期以下，隨著編戶齊民階級之逐漸形成，徵兵與授田是政府相輔並行的雙軌政策（杜正勝 1990，頁174—186），凡國家公民，大概多能得到一份耕地<sup>17</sup>。戰國初年勵行改革的國家也相繼闢草萊、盡地力，然而齊民小農並不能獲得溫飽，《管子》多處指摘這種嚴重的危機。〈國蓄〉篇問曰：

君引鋸量用（田）<sup>18</sup>，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

17 〈魏戶律〉曰：「段（假，賈也）門逆呂（旅）、贅婿後父，勿令為戶，勿鼠（予）田宇」（《睡虎地秦墓竹簡》頁293）。賈門逆旅、贅婿後父不得受田。《商君書·徠民》曰：三晉「其寡萌賈息民，上無通名，下無田宅，而恃奸務末作以處。」孫詒讓云：寡萌當是賓萌（參見高亨《商君書注釋》）。上無通名即律文之「勿令為戶」，「下無田宅」即「勿予田宅」。除這些人之外，凡國家的成年男子大概多可受田的。

18 鋸，尹知章《注》云：籌也。按《荀子·君道》曰：「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王先謙《集解》引郝懿行曰：探籌，蓋如今之掣籤；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疆，今有拈圖，疑皆非是。然而郝氏引《慎子》則近是。《慎子·君人》曰：「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非以鉤策為過於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鉤是量田的器具，故荀、慎二家皆以為能得公平。疑《管子·國蓄》之「鋸」即「鉤」；而「量用」之「用」蓋是「田」字之壞。

政府測量土地，授予人民耕種，估計收成以當支出，然而人民卻有飢色，原因安在？〈輕重甲〉也發出同樣的疑問。總結其因是「穀有所藏」，尹知章云「人乏於食者，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正得其解。因此這派人發現法治之士所講的「彊本節用」並不能真正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輕重乙〉云，紀氏之國，厲行強本節用，五穀雖豐滿，卻四流而歸於天下，民穀盡為天下虜，而其國亡。〈地數〉亦主張政府不能只謀求「富本而豐五穀」之道，因為

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吾）錢（賤）而天下貴，則稅（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sup>19</sup>。

五穀愈豐收，若無善守之策，物價必愈便宜，利潤為天下豪富所掠奪，結果齊民即如《漢書·貨殖傳》所說，成為法律身分同列的富商蓄賈之僕虜，〈國蓄〉篇謂之穀有所藏，利有所并，乃使民下相役。如此一來，輕則以富役貧，重則亡國陪家。

這種富商蓄賈就是《管子》所稱的「輕重之家」。他們繼承范蠡以來「積居與時逐」的傳統，轉貿貨賁而不固守財幣，以「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原則來經營貿易。買賣取與，戰國商人是以貨幣、五穀和其他物產相對待而調節運用的，後者總稱曰「萬物」。《管子·乘馬數》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賁，財物之賁與幣高下。」〈山至數〉曰：「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財物賣買以金錢為準，所以商賈得以貨幣操縱萬物。同時因為「五穀食米，民之司命」（〈國蓄〉），於民生物質最居重要，可「獨貴獨賤」（〈乘馬數〉），所以五穀也具有貨幣的功能。〈乘馬數〉故曰：「穀重則萬物輕，穀輕則萬物重。」這顯然是自〈計倪內經〉的收發和白圭的取與，長期發展下來的傳統。當然，輕重家首要之務是要控制民之司命的五穀和民之通施的貨幣，如《墨子·經說下之上》所說「刀羅相為買（價）」，操縱五穀與貨幣，互為輕重<sup>20</sup>，以壟斷天下的財富。

19 《管子集校》，王壽同云：「稅」當為「稅」，稅者奪之假字也，參頁1151。巨錢，俞樾云，「吾賤」之誤，頁1156。

20 《墨子·經說下之上》曰：「刀羅相為買，刀輕則羅不貴，刀重則羅不易。王刀無變，羅有變，歲變羅則歲變刀。若鬻子。」刀是貨幣，羅指五穀，二者互相為價。照物質供需原理，貨幣多則幣值降低，必須持多錢才能購買少量之穀，故刀輕則羅必貴。反之，刀重則羅必輕（易）。故梁啟超《墨經校釋》將二「不」字皆以意校改作「必」（頁71）。胡寄窗不改字，而有進一步的解釋。他說，貨幣價值小時，從價格上看是羅貴了，但二者都須反映其價值，故無所謂貴。反之，貨幣價值大時，從價格看是羅賤了，也因二者都須反映其價值，故仍無所改變（《中國經濟思想史》上 頁132）。巫寶三〈管子輕重學說的淵源、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說同。這是墨者著眼於交換雙方總價值量的論辯，雖合乎詭辯的邏輯，卻不符合經驗世界的事實。



關於富商蓄賈經營謀利的方式雖缺乏直接史料，但《管子·輕重》諸篇既然針對他們立論，我們可以利用這批材料反映商人的輕重術，他們的基本手段即〈乘馬數〉所謂

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

泄是拋出，射是吸入。此一進一出之「物」包括五穀與貨幣，二者相互為用。故〈山權數〉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雇也）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五穀和貨幣互為輕重的道理，〈山至數〉說得很明白，曰：

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價）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上）<sup>21</sup>

，幣為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

收成好，五穀市價跌到去年的一半，擁有錢幣的商人乃以此低廉價格大量購買五穀，於是五穀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大量的貨幣流入市場，一般人民自然感受幣多而賤、穀少而貴的壓力。〈國蓄〉也說：「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與）<sup>22</sup>，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物適賤則半力（分）而無予（與），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因為五穀豐收，人民有餘，雖半價出售亦無人問津，價格必輕，商賈「斂積之以輕」，而凶年人民不足，價格必貴，商賈則高價販賣他們所積聚的糧食，此謂「散行之以重」。商賈既以半價買入，又以十倍賣出，利潤之高自可想見，這就是〈國蓄〉所謂「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的「輕重之大利」。

## （二）政府與富商的競爭——平糶與輕重

商人以輕重術操縱市場，齊民小農終歲勤勞而不得裹腹，遂受豪民趨役。政府站在統治的立場，為維護其基本勞動力，自然不願見到這種「鬥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乘馬數〉）的現象，於是設法使齊民小農能維持最基本的溫飽生活。他們採取的方法是平抑物價。上節說過〈計倪內經〉主張政府利用收發買賣，維持物價穩定，

---

墨辯也承認法定貨幣（王刀）之值雖不變，穀價則是浮動的；如果穀物價格年年變動，長期下來也會影響法定貨幣的價值（參用胡氏說）。墨辯說貨幣和穀物之相互為價就像大小錢之母子相權（梁啟超上引書），顯然也和《管子》一樣，承認五穀具有貨幣的功能。

21 「穀為君」，安井衡曰，「君」當依〈山國軌〉作「上」，君、上義近，轉寫之訛耳。張佩綸、戴望說同。見《管子集校》頁1128。

22 〈國蓄〉有「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予，《通典》引作「與」，尹知章《注》曰：「易也」（卷十二）。

使五穀賤不傷農，貴不病末。〈貨殖列傳〉亦述計然之論曰：「農末俱利，平糴（原作糴）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越王勾踐採行的情形今不可考，但戰國初期魏文侯的計臣李悝則承襲此法，推行過平糴政策的。

《漢書·食貨志上》說，李悝主張政府干與市場，視年成之豐歉，或糴或糶，以免物價波動過劇。常年百畝之田收成如為五十石，估計上熟四倍，收六百石，扣除什一之稅和一家五口食糧，尚餘四百石。中熟收成三倍，餘三百石，下熟收成二倍，餘二百石<sup>23</sup>。市面上剩餘的五穀則由政府收購，

故大孰則上糶三而舍一，中孰則糶二，下孰則糶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上熟餘四百石，政府收購三百石，農家留存一百石供衣物、社祭、疾病之用。中下熟依次類推。相反的，小飢收成只有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比常年各少五十、八十和一百二十石。政府乃各發小熟、中熟和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有人認為按照這種辦法，愈飢饉，市面供應之糧食愈多，反而是常年最缺糧，殊不合理（胡寄窗 1962，頁276）。然而平糶政策的精神是「價平」，一糶一糶，於是

雖遇饑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最終目的在於「使民適足」。〈食貨志〉所述三熟三飢固然是約略的估計，小飢發小熟之斂，大飢發大熟之斂也不能機械式地排比對應。

《管子·輕重》諸篇保存一些比較接近戰國早期平糶法的主張，〈揆度〉曰：

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一種穀減產，糧價可漲十倍；兩種穀減產，糧價再漲十倍，政府出面干與，既可壓抑物價，又可使小農免於高利貸的剝削。干與之法，是「夷疏滿之」。此語頗難解，唯《管子》別篇有「絺素滿之」，意涵相近。〈事語〉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絺素滿之。」這是講儲藏五穀，與〈輕重甲〉的「夷競而積粟」切合。夷疏、絺素、夷競多家注釋《管子》雖認為三語相通，但訓詁的意義則南轅北轍。自上下文意推之，郭沫若說是李悝平糶法之衍變，當較正確（《管

23 據實核算，上熟餘450石，中熟餘315石，下熟餘180石。〈食貨志〉云下熟餘百石，疑當作「餘二百石」，與下文「下孰則糶一」才不矛盾。師古注引張晏曰：下熟，「官糶其五十石，云下孰糶一，謂中分百石之一」，不但牽強，也與中熟之糶不符。

子集校》頁1190－1191）。夷者平其價格，疏者通其有無，五穀以平價在市面流通，即是平糶。

〈事語〉曰：「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講究儲藏穀粟，因為平糶法的先決條件在於政府有所積藏。能藏則滿，〈事語〉「夷疏滿之」之「滿」即是積居。當生產十分穀而守藏五分，才能在欠收時拋出積糧，平穩物價。〈山權數〉也說：「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決塞者收發輕重之道也<sup>24</sup>，基本原則是

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山權數〉）。

「軌守其數」即守藏一定數量之穀物，「准平其流」是散發穀物使物價平准。國君能行平糶，用〈乘馬數〉的話說，謂之「持流」，此乃專門對付富商蓄賈以免「鬥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的政策。大商人運用輕重之術相奪齊民小農之財，間接也是政府之財，這是鬥國的亂政，「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乘馬數〉）。政府持流如何阻止商賈之奪民財呢？〈揆度〉曰：「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當政府能流散積穀時，豪民便無法盤踞高價不下，國內的物價才得以平衡，不會被他們操縱。

戰國時代深明輕重之理的計臣所建議的財經政策不限於平糶，他們進而以「子之道還治子之身」，模倣商人致富的輕重手段來打擊商人，終於使政府變成最大的囤積者和剝削者。他們還是和白圭一樣，企圖掌握衣食兩大宗的民生物資。〈國蓄〉曰：

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與）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

予同與，易也。穀賤買穀，布賤買布，以政府的龐大財力干與自由市場；然而市價低廉，生產者受害，這裡政府並不是抱著平糶的態度來紓解民困，反而利用自由市場價格而謀取利潤。〈國蓄〉又說：「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

24 《管子》「決塞」一詞首見於《經言》，〈七法〉論七種治術，決塞其一，曰：「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不明於決塞，而欲馭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但《輕重》諸篇的決塞範圍較窄，〈地數〉曰：「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限於買賣收發而已。〈山權數〉解釋決塞也說：「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行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准即准平之准。計臣相信輕重之術是治國的重要方法。

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政府即利用不同物資間價格的差距來賺錢，和輕重商人毫無二致。充斥市場的物資經過政府的收購，價格雖然提升（散則輕，聚則重），但齊民小農已無餘糧可以出售，所謂「財之橫（價也）可得而平」的調整價格，只有囤積才能獲利，而政府由於大量收購物資，正是最大的囤積者，故計臣說「君必有什倍之利」（〈國蓄〉）。當然在此情況，政府也不能禁絕積貯商人乘高價謀利，最後便形成政府與民間財富團體競爭的局面。

政府與私人財閥競爭，有其方便之處，第一，憑借稅收傳統，政府可以控制具備貨幣功能的穀物；第二，自戰國中期以後，有些國家的中央政府能更有效地控制貨幣。這兩件輕重利器操持在手，理論上講，應該可以無往而不利。誠如〈山至數〉所說：

國策出於穀，軌國之策，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術）也。

彼穀重而穀輕，當即「彼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之省文，義見於〈國蓄〉。計臣認為政府只要掌握五穀和貨幣便不怕富商蓄買、輕重之家興風作浪，治國之術即在於此。

以齊國來說，至遲當「齊法化」通行後，刀布必出於官府，故《輕重》很少討論管制鑄幣的問題。但五穀則不同，其生產散在民間，尤其封建貴族苗裔的豪家還占有大量土地，算是第二種貨幣的製造者，政府乃想運用他管制的第一種貨幣來操縱民間的第二種貨幣，〈山國軌〉謂之「調立環乘之幣」。原則是

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

政府挾其強制權威把自鑄之貨幣貸給人民（置公幣），再向人民收取五穀，發揮五穀的貨幣作用。於是貨幣與五穀互為循環，謂之「環乘之幣」。循環的辦法，計臣有相當細密的設計，一是以幣收穀，當「重歲豐年五穀登」時，對上腴高田之民說：「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嚮）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政府只收貸款之什七，豈非仁政？但豐年市場價格賤，政府以幣折穀，於是「穀為上，幣為下」，低廉的五穀大量流入官府困倉，而貨幣充斥民間，穀價「坐長加十」。二是以穀收帛，「女貢

織帛苟合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市場穀價已漲，政府用收藏的五穀按市價購買民間的布帛，於是五穀以收購時的十倍價格（穀廩重有加十）再度流入市場，故曰「環穀」。三是以官藏之穀收民間之錢。中央政府對放高利貸的「大家委貲家」宣佈，國君出游，每人須出借錢幣若干。又對地方政府宣佈，國君隨從大隊人馬就食於縣，不可讓其左右匱乏。地方政府乃積聚糧穀，市場穀價於是「坐長而十倍」。出游之後，國君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償也）之。」政府向委貲家借貸的錢幣改以昂貴的五穀償還，於是原先控制的穀物出籠，而民間的貨幣又回籠。這時「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市面上貨幣既少，

幣重而萬物輕，（於是政府）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隆而止。

可見政府雖有權鑄幣，計臣知道通貨膨脹的利害，並不主張無限鑄幣，而是利用貨幣與五穀在政府與民間循環的手段，一進一出，乘其輕重，而壟斷民間資源。以上〈山國軌〉所論「環乘之幣」政策的基礎是政府的絕對權威，果真徹底實施，必定政府富而社會貧。

五穀和貨幣循環運用，對政府而言，還是比較看重兼具實用與價值兩種功能的五穀，故《輕重》論之甚詳，或許也與范蠡的傳統有關。〈山至數〉說：「守國者守穀而已」，在治術上謂之「穀策」。辦法是收成後乘機低價收購，曰：

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秋收，市面穀物供應充足，價格降低三分之一，地方政府以公款收購之。而地方登記的特別繳納（籍粟入）和常歲賦稅則准予以穀代幣，於是農業收成多半流入政府倉庫。政府挾其積穀，在其他季節謀利，〈山至數〉曰：

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

到春天，民間存糧漸少，穀價開始上漲，以至加倍，夏天亦然，人民皆以市面價格向政府購買糧食。這就是政府「以重射輕，以賤泄平」的手段，輕重的原理和穀幣循環是一致的。這辦法如果徹底執行，地方政府儲藏大量的五穀和貨幣，小農生活所需莫不受制於君；他們最大的債權人是政府，而非富商豪民了。

絕對經濟優勢再加上絕對政治權威，如虎添翼，萬夫不能敵。〈臣乘馬〉也論政府借貸予農民，收穀抵幣之妙用曰：

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泰）<sup>25</sup>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

春天開始播種，農民青黃不接，政府借貸給人民，等到秋天收成，穀價減半，政府以幣折穀，大量的收成乃流入政府困倉。政府既然掌握大半的糧食，市面糧少，穀價自然再漲。這時政府鳩工庀材，營作器械，以穀准幣來支付工資，因爲穀貴，政府從中獲得大利。這一來，政府不但可以控制市場的穀價，而且以幣准穀，再以穀准幣，相環出納，表面上不向人民藉歛，卻可以收到更高的利益。所以我們說政府果真推展輕重政策，它便成爲最大的剝削者。

小農經濟最易瀕臨生活臨界點，青黃不接時總不免要借貸，現在政府來做債權人，〈國蓄〉說「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五月蠶功納春賦，八月秋收完夏貸，長年累月，周而復始地循環，農民豈不變成政府的農奴了嗎？

前文說過輕重商人乘「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緩急」（〈七臣七主〉）而謀厚利，《輕重》的計臣當然也深明「時之義大矣哉」。上述〈山至數〉的穀策和〈臣乘馬〉以穀准幣所憑依的春秋，正是恰當謀利之時，〈輕重丁〉甚且認爲四時皆有圖利的機會。曰：

孟春且至，溝瀆阮（阨）而不遂，谿谷報（鄣）<sup>26</sup>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射），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射），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射），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射），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射），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25 「春」當是「泰」之誤，王念孫、安井衡、聞一多及林圀諸家說同，參《管子集校》頁1023。

26 阮、報二字從王引之改作阨、鄣，參《管子集校》頁1266。



孟秋整治甲冑弓弩，孟冬農閒軍賞，絲麻、五穀和黃金皆應時之需，以此類推，孟夏的「布」當指布帛。「謝」同「射」。政府謹守各季節的必需物資，運用「以重射輕」的經營手段，自然可以取代向來的富商蓄賈。政府成為最大的商人，夏天控制布帛，秋天控制絲麻，冬天控制五穀，春天控制貨幣，因應時需可以獲得更大的利潤，這種財經政策叫做「國準」。〈山國軌〉也說，春夏秋冬，「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使「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這不是政府負責照顧人民的生活，而是人民成為政府的顧客。

商賈利用人民的緩急而謀利，一般多乘列國政府為戰爭而發布政令之時，但在《輕重》計臣看來，政令緩急也是政府聚斂財物的一種手段。〈揆度〉曰：「號令者徐疾也」。〈山權數〉曰：「令之徐疾，馭屏萬物，守之以策。」又曰：「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一當十用，政府如何能操縱盈餘之九呢？〈地數〉曰：「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郭沫若云：費，「弗背」二字誤合（《管子集校》頁1145）。坐起弗背時，即一進一出不違背時機。像齊國這種「衢處之本，通達所出，游子勝商之所道」的地方，貿易發達，政府能乘「令有徐疾，物有輕重」之勢，「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地數〉）。所以說「王者乘時，聖人乘易（變易也），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謂之國會」（〈山至數〉）<sup>27</sup>。

總而言之，政府不論控制五穀與通貨，假借政令徐疾，射泄輕重，操縱物價，最主要目的在打擊富商蓄賈豪傑之家。〈國蓄〉說：一旦「穀有所藏」，「利有所并」

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

為防備輕重之家相奪相泄以免國家淪為「鬥國」的混亂狀態（〈乘馬數〉），計臣認為政府應「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國蓄〉），守住「天權」與「國準」。〈山權數〉曰：

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不〕<sup>28</sup>備准，下陰相隸。

27 「彼善為國者」至「謂之國會」據張佩綸移此，《管子集校》頁1133。

28 「不」從聞一多補，參《管子集校》頁1093。

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不如民貧，委積則虛矣。

計臣以爲商人射重泄輕，經濟被他們控制，政府喪失權衡的準繩，於是人民互相剝削（下相求），結果弱者必爲強者所驅使（下陰相隸）。富商蓄賈運用其經濟優勢，行輕重之法，既然役隸齊民，必出現「中一國而二君二王」的局面（〈輕重甲〉），這才是刑罰暴亂的根源。站在統治者的立場，寧願人民貧而聽命，不願富而犯法。故政府行輕重，雖自財經政策出發，「塞民之羨<sup>29</sup>，隘其利途」（〈國蓄〉），終極目的則是政治。只有社會上不再存在著可與政府頡頏的經濟勢力，對於人民之予奪貧富才能真正操於國君，保證一國之中只有一君一王。此之謂「利出於一孔」（〈國蓄〉）。所以說：

凡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爲上治（〈國蓄〉）。

這才是輕重術的大用。就此觀點而言，《管子》計臣倡議輕重雖爲謀利，更深一層的目的則爲著強化國家的統治，打擊對象是社會上富可敵國的豪商蓄賈。

《管子·輕重》所述的財經政策恐怕亦如諸子百家的建言，沒有多少付諸施行。即使以此理論所出的齊國來說，民間仍多積貯大戶，據說「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山權數〉），而市場也常見新築儲藏五穀的困倉（〈輕重丁〉），貴族與商賈皆囤積，故〈輕重甲〉將「遷封食邑」與「富商蓄賈」並稱，曰「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或「國之豪」。韓非稱這些「蓄積待時而俾農夫之利」的人爲「邦蠹」（《韓非子·五蠹》）。輕重之家或富商蓄賈是列國相當普遍的現象，丁氏當是有封邑的貴族，政府不得藉其斗升<sup>30</sup>；而近年安徽出土的鄂君啟節也證明楚國貴族經商

29 「羨」，諸本作「養」，聞一多疑爲「羨」之誤，引《鹽鐵論·錯幣》「禁溢羨，厄利塗」爲證。郭沫若從之，見《管子集校》頁1052—1053。按〈國蓄〉下文曰：「均羨不足」，當以「羨」爲是。

30 《管子·輕重乙》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藉斗升焉。」何如璋云：崇蔣二家無可考，丁當是丁公之後，惠當是惠公之後。張佩綸云：「崇弟蔣弟」四字全誤，以《管子·輕重丁》證之，乃「宗臣守臣」之，指高、國也。按《左傳》東郭偃曰：「君出自丁」，謂崔氏也，惠乃桓公之子。安井衡曰：崇蔣二邑名，桓公二弟封焉。總之，《輕重》乃戰國託古之作，這些名氏恐怕難考。唯安井云，貴族專其邑，世收國君歲歲所網取之稅，頗得其旨。〈輕重丁〉云「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若依《管子·治國》「中年畝二石」和銀雀山竹簡《田法》「中田小畝畝廿斗」（《文物》1985年4期）計，百畝歲收二百石，一鍾合64石，小農歲收三鍾強；則五千鍾將是一千六百多戶小農的生產總額。

，政府給予免稅特權和種種方便<sup>31</sup>。東方列國的富商蓄賈既與豪門權貴往往合一，《輕重》計臣那套強化中央政府、削弱社會力量的財經政策不能實行也就可以理解了。

反觀大約同時西方之秦，商鞅頒布墾草之令，「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飢歲無裕利」（《商君書·墾令》）。這大概就是蔡澤所說的「調輕重」吧（《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商鞅長於貿易發達的衛國，必了解商人輕重謀利的巧妙，但他的政策和理論比起東方的計臣卻簡陋得不可以道理計。他在秦變法，令出必行，走軍政改革的路子，赤裸裸地輕蔑豪富，壓抑商賈，目標雖亦強化中央，但手段方面和《輕重》以商人之道整治商人之身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 四、新時代致富的企業——鹽和鐵

在戰國時期，鹽乃舊物，鐵則是新資源；但它們同樣成為新時代編戶齊民的生活必需品，造就了煮鹽和冶鐵的大商人。鹽鐵商人販賣之物固與糧商不同，經營方式也不必謹守「乘時」之輕重；然而由於生產鹽鐵的成本更為雄厚，一旦經營成功，便形成壟斷的局面，所以漢人並稱「鹽鐵」與「輕重」。他們既賺齊民小農的錢，同時也變成役使齊民的豪富。

### （一）鹽鐵與編戶齊民的社會

中國人食鹽歷史的起源今難查考，傳說遠古夙沙氏煮鹽，蓋言食鹽之早<sup>32</sup>；根據先秦禮書，周人生活中鹽已佔居相當重要的地位，尤為貴族不可或缺的佐膳之物<sup>33</sup>。

31 鄂君啟節資料之發表首見於《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兩篇論文：郭沫若〈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和殷滌非、羅長銘〈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爾後論述頗多，考釋有于省吾〈鄂君啟節考釋〉、商承祚〈鄂君啟節考〉。這是楚懷王發給鄂之封君名啟者的免稅與通行證，分陸行的車節和水行的舟節兩種，車節說：「車五十乘，歲能返。毋載金革毬箭。如馬，如牛，如德（特），屯十以當一車；如櫓徒，屯廿櫓以當一車；以毀於五十乘之中。」舟節說：「屯三舟為一舫，五十舫歲能返。」鄂君的商隊至少五十輛車和五十組大船。一組大船由三條小船組成，商隊若不用車，一車折抵十四牲口或二十個挑夫。

32 《太平御覽》865引《世本》曰：「夙沙作煮鹽」。又，宋忠曰：「夙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故以為魚鹽之利」（參見秦嘉謨輯補本《世本·作篇》）。齊靈公（581 B.C.—554 B.C.）在春秋中晚期之間，宋忠若指夙沙衛為《世本》之夙沙，顯然太晚，不可信。《呂氏春秋·用民》曰：「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高誘《注》：「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說文解字·十二上鹽部》曰：「古者夙沙初作煮海鹽」。漢人唯稱用鹽之古，基本觀念是正確的。

33 《周禮·膳夫》曰：王饋，用醬百二十饗。鄭玄《注》云，醬謂醢、醢。六十饗醢，六十饗醢

這種普遍必需的東西生產地區卻相當局限，遂成為少數人致富的媒介。

中國地區出產的鹽有四種：海鹽、池鹽、岩鹽和井鹽。東周人常提到東海岸的海鹽與山西解池的池鹽。《周禮·鹽人》有苦鹽和散鹽，杜子春讀苦為鹽，即池鹽，鄭玄謂散鹽乃煮水為鹽，也就是海鹽。據張守節說，池鹽可分作畦鹽、花鹽和井鹽，皆承天雨，曝乾得鹽，池若非畦者曰畦鹽，池中鑿井者曰井鹽，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者曰花鹽。河東池鹽屬於畦鹽（《史記·貨殖列傳·正義》）。至於承雨而生之井鹽，雖然和四川的井鹽同名，實質是不同的。巴蜀未通中國之前，當地人已發現鹽泉，汲泉煎煮，即今之井鹽（任乃強 1986，頁281）。另外西北地區開採的鹽礦曰岩鹽。但四川井鹽和西北岩鹽先秦文獻很少提到。

。鄭《注》本於《周禮》〈醯人〉和〈醢人〉。醯是醋，以酒或酒糟發酵而製成的調味。醢是肉醬的通名，細分之，有骨曰醢，無骨曰醢。鄭玄說，作肉醬，先將肉拍扁使乾，然後剁碎，「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醢中」，經百日而成（〈醢人·注〉）。可見作醢是需用鹽的。〈醢人〉曰：王舉所共六十饗之醢，「以五齊、七醢、七菹、三醢實之」。齊當作齋，這些食品的內容，五齋是昌本（昌蒲根）、脾析（牛百葉）、脣、豚拍（豬脊或肩）和深蒲，七醢是醢（肉汁）、羸（蜃蜎）、蠃（小蛤）、蜆（蛾子）、魚、兔、鴈等之醢，七菹者韭、菁（蔓菁）、茆（鳧葵）、葵、芹、箔、筍等之菹，三醢乃麋、鹿、麋之醢——包括肉類、野菜和水產。七菹大抵近於今日之鹹菜，水產之醢台灣猶遺蝦、蚶、小魚之作法，肉醢或醢朝鮮尚存。以上齋、醢、菹、醢的製作都使用大量的食鹽防腐。《禮記·曲禮》談飲食禮節，有一條曰：「毋獸醢。……客獸醢，主人辭以寔」。寔者，無禮也。客人飲醢是失禮，主人須先謝罪，因為「作醢淡而無鹽，故可獸也」（〈曲禮·疏〉）。可見醢用鹽甚多。

古代食品之醢猶不限於〈醢人〉所述，《禮記·內則》記載上大夫食禮的庶羞二十豆，醢五、芥醬一，當是作為牛、羊、豬肉羹、牛、羊、豕炙和魚膾、雉兔、鶉鴉等的佐料。〈內則〉云人君燕食二十六品，其中蜆醢、雉羹、肺羹、雞羹、犬羹、兔羹、濡豚、濡雞、濡魚、濡鼈。羹謂肉汁，濡謂烹之以汁調和。孔穎達《疏》引皇氏曰：「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為數」，也就是說以上那些羹濡在烹煮過程已加入醢醬調味了。另外有蜆醢、兔醢、魚醢、醢醬分別配股脩、肺羹、麋膚（切肉）、麋腥而食，如〈醢人〉的七醢之屬，單獨為豆，作佐料沾用。二十六品還有桃諸、梅諸配卵鹽。鄭《注》云：「卵鹽，大鹽也」。諸，孔《疏》引王肅說是菹，大概桃乾、梅乾之類，食用時以大鹽之和。

堪稱古代食譜最精美細緻的八珍同樣離不了醢。〈內則〉所記八珍用醢者五，稻飯沃膏加醢煎熬成膾飯曰淳熬，黍食沃膏煎醢曰淳毋；牛肉薄切漬以美酒，佐以醢或醢醢而食；牛羊鹿肉火上熬之，再加捶打，摻酒桂屑與薑「而鹽之」；欲和汁則「煎之以醢」。最後還有一珍，以叫化雞的方法處理豚，再用慢火燉三日三夜，「而后調之以醢醢」。

總而言之，封建貴族之庶羞，不論百二十饗、二十六品或八珍，幾乎都離不開食鹽。貴族肉食，所用醬醢既如上述；至於疏食的庶民除粗米飯外，大概就是醬菜了，也要用鹽。孔《疏》故曰：「凡人所食，羹飯為主，助以雜物，醬是衆食所須。」他引《禮記·曲禮》食物擺放的位置說：「膾炙處外，醢醬處內」。處外者離人遠，不容易取食；處內者才是主食。所以即使是貴族日食，最主要的下飯佐物還是醢醬。王莽說：鹽是「食肴之將」（《漢書·食貨志下》），正道出古人飲食的特點。

《周禮》專設〈鹽人〉一官，「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又有〈籩人〉，掌「朝事之籩，其實形鹽」。此二職官供奉之鹽，儀式性的意義較大，其量遠不及消費性的食鹽。論古人用鹽不能只注意儀式性的形鹽而忽略鹽在古食膳中所占的重要分量。

鹽之生產既受天然環境限制，非所有封建貴族可能擁有。周天子雖可利用賦貢的方式獲得，如海岱青州貢鹽（《尚書·禹貢》）；同列諸侯和各個邦國內的大小貴族則無權力指命封域外的國家進貢，他們食鹽的來源大概只有靠貿易了。但今存文獻寥寥可數，只《史記》講到齊太公「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齊太公世家〉），《左傳》說河東郇瑕故國「沃饒而近鹽」（成六），顯見春秋以前佔得地利的諸侯或采邑領主之從事食鹽貿易，數量大概仍相當有限，顧客或多是貴族，至於庶民的食鹽，更難考查。不過，傳世文獻透露的歷史現象則是，鹽成為重要的商品乃春秋晚期以後的事。如果以鹽佐食的飲食習慣非周代新創，那麼封建時代的庶民，甚或貴族的食鹽從何而來呢？《禮記·曲禮》有一點線索可循。〈曲禮〉云，凡供祭宗廟的祭品皆有特定的代稱，如牛曰一元大武，雞曰翰音，鹽則稱作鹹鹺。「鹹」「鹺」，字皆從鹵，鹵者斥鹵也。古代斥鹵之地所在多有，春秋楚國蔣掩書土田，其中有一項曰「表淳鹵」（《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魏國史起「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呂氏春秋·樂成》），則鄴附近原有不少不能耕作的鹹地。鄭國為秦築渠，「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云云（《史記·河渠書》），可見關中鄭國渠四周原來是斥鹵。此類「鹹鹵斥澤」（《管子·輕重乙》）在古代似甚普遍。斥鹵之地積淺水經過曝曬，地面便結一層薄鹽；有的地方則「煮土成鹽」（《水經注·漾水注》）。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九云：「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即指此。《史記·貨殖列傳》曰：「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因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封建時代中原不產海鹽和池鹽，飲食所需之鹽蓋多出於鹹地之鹵。

鹽取代鹵，當然是一種進步，這過程今日也同樣難以追尋。我們只知道這種轉變似和編戶齊民的出現並行。一旦鹽的製造趨於普遍，隨著商業之發達，食鹽人口不斷增加，以鹽代鹵的現象從上層社會逐漸往下延伸，傳統飲食用鹽的習慣遂更加強。此時已到春秋戰國之際，新時代揭幕了。

和民生相關的鐵也在此時登上歷史舞台。

鐵器繼青銅而起，其歷史意義和青銅大不相同。最早的青銅雖製造刀、鑿等工具，進入國家時代以後，主要卻作為封建統治象徵的禮器和兵器。青銅工具固然持續存在，依附於封建禮制，以製造車軸宮室，唯其本身似無大進展。至於青銅農具，迄今



考古出土仍非常有限，學者雖不乏主張中國有過青銅農具之人<sup>34</sup>，一般相信中國古代農業生產工具轉變的主要趨勢是由鐵器直接取代木石骨蚌之器的。鐵器以農具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上，其特徵是經濟性的，而與青銅之政治社會性不同。

鐵器初現的年代目前學者尚有爭議，唯可信的考古資料仍限於春秋晚期，數據不多，也不以農具為主（黃展岳 1976）。根據近年考古的綜合觀察，戰國早期鐵製農具不但數量少，器類簡單，出土地點有限，而且多屬小型器件，顯示鐵器開始投入農業生產行列不久。但戰國中期以後，鐵農具出土的情況便與以前截然不同，件數多，比例高，器類雜，出土地點廣被，工藝技藝也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雷從雲 1980a）。以件數和比例而言，遼寧撫順蓮花堡燕國遺址不及三百平方米的探坑中出土鐵器八十餘件，農具便佔七十餘件。這是戰國晚期遺址，也可以遲至漢初（王增新 1964）。河北石家莊戰國中或晚期趙國遺址，出土農具四十七件，佔生產工具之65%（《考古學報》1975年1期）。河南輝縣固圍村五座戰國晚期魏墓出土鐵器九十三件，農具也佔鐵器的六成以上（《輝縣發掘報告》頁108）。雷從雲（1980a）統計熱河敖漢旗老虎山、山西長治分水嶺、河北興隆壽王坟、河南輝縣固圍村、湖南長沙、衡陽六十一座墓、廣西平樂銀山嶺等處戰國墓葬出土之生產工具，鐵農具所佔比例高者超過97%，低者亦有53%以上，六處平均數約70.5%<sup>35</sup>。這些墓葬多屬戰國晚期，可見此時鐵農具已經相當普遍。考古家約略估計，直到近年為止，出土上千件的先秦鐵器種類繁多，包括手工業、農業生產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絕大部分屬於戰國中晚期，分

- 34 《詩·周頌》多篇言及農事，頗有農器。〈臣工〉「庠乃錢鎛，奄觀銍艾」之錢、鎛、銍、艾，〈載芟〉「有略其耜」與〈良耜〉「耒耜良耜」之耜，學者多認為這是金屬農具。較早主張殷周農具使用青銅製品最力者當推唐蘭（1960），繼之而起者是陳振中（1980、1981、1982）。他們討論的範圍包含博物館的收藏品和新出土的考古文物，唐氏所認定者有些可能是兵器。陳氏分別論述殷周之末耜、錢鎛和銍艾，至1980為止，其數據固比早他二十年的唐氏統計資料為夥，結論是殷和西周時代的農具生產曾大量使用青銅鑄。陳良佐也是主張我國使用青銅農具的人（1984），不過他承認商至西周末，中國北方的農具猶以石、蚌、骨為主，到春秋時代，也許是中期，青銅農具才增加。按照他的說法，即在鐵農器出現以前，中國有過短暫的青銅農具時代。我們固然不否定殷周有些青銅農具，但同時出土的骨蚌石在考古遺址中卻佔絕對優勢的比例，佟柱臣討論二里頭文化以來金屬器取代石骨蚌器的過程（1983），以農具而言，直到西周，石骨蚌器仍佔主導地位。雖然青銅農具之種類和數量有逐漸增加的趨勢，要等到春秋戰國鐵器出來，金屬農具才大量排斥石骨蚌製諸器。佟氏採用比較方法以發現農具質地的發展趨勢，當比窮舉考古資料而得的結論較為可靠。
- 35 據《輝縣發掘報告》，固圍村五座魏墓出土鐵器93件，雷從雲〈戰國鐵農具的考古發現及其意義〉一文正文敘述則說鐵器95件，而同文統計表又說約69件，鐵農具58件，佔百分比84.1%。此比率可能將69誤計作96，本文數據則根據原報告93件，鐵農具佔所有鐵製生產工具的62.4%，雷氏之表如下：



布地區遍及當時的齊、燕、秦、韓、趙、魏、楚、越等地（殷璋璋 1984）。戰國遺址雖有少數個案仍然出土石製生產工具，如上舉撫順蓮花堡有七件石器，一般說來，當時農作大概逐漸改以木把鐵刃的工具了。

從鐵製農具器類方面考查，也可發現鐵器在整個農業生產過程中佔居的重要地位。大凡農事程序，先起土整地，然後播種，作物茁長期間要中耕除草，最後才是收穫。每個階段都有相應的農具，起土整地使用犁、耜、耨，中耕整地使用錢、鏵、鏟、鋤、鈹、耨，收穫用鎌刀（參看劉仙洲 1963）。據楊寬的觀察，戰國早期的鐵農具只有耨、鏟、鋤、鏟（空首布式鋤）（楊寬 1980），但自中期以下，考古出土的鐵農器便有犁鏵、耨、鏟、耨、鏟、耙、鋤和爪鎌等類別了（雷從雲 1980b）。如果引證文獻來比況，《管子》述農事之立，〈海王〉曰：「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當屬戰國早期的情形；〈輕重乙〉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耨、一椎、一銍」，那就是戰國中晚期的寫照了。器類的發展顯示戰國中晚期以後，農事重要過程，舉凡起土整地、中耕除草以及收穫，大概都得仰仗鐵製農具。足見鐵器負擔了農業生產的主要任務。

雷從雲（1980a）又分析上述老虎山、分水嶺、壽王墳、固圍村、長沙衡陽及銀山嶺等處報告的鐵農器，耕墾農具佔所有鐵農具的70%，若廣西平樂銀山嶺一項不計，則高達84%。這些數據證實封建制崩解以後，郡縣國家推動的「盡地力之教」的確不是徒託空言。反過來說，如果没有鐵器投入農業生產行列，仍然沿襲傳統の木石蚌殼農具，新的土地開發政策也不可能成功。

（接上頁）

出土地點	生產工具總數	鐵農具數	鐵農具／生產工具	耕墾農具數	耕墾農具／鐵農具
敖漢旗老虎山	36	31	92.7%	20	57.1%
長治分水嶺	31	21	67.7%	18	85.7%
興隆壽王墳	85	52	61.2%	47	90.3%
輝縣固圍村	約69	58	84.1%	54	93.1%
長沙、衡陽 61座墓	21	17	80.9%	16	94.1%
平樂銀山嶺	約170	91	53.5%	0	0

然而鐵器改變生產形態的功能尚不止此，它使小農能夠脫離封建時期的集體勞動，而為獨立操作的個體農戶。楊寬特別指出到戰國中期，雖然有的鐵農具只有鐵製刃部，如V字形鐵口犁、一字形和凹字形鐵口舌、以及凹字形侈刃鐵口鋤，這種嵌刃式鐵器刃部雖仍單薄，但畢竟使得農具的鋒刃堅固銳利，便於推廣牛耕，便於精耕細作（楊寬 1980）。而秦漢以降的精耕細作農業（許倬雲 1978）實際上是和編戶齊民的個體小農戶互為表裡的。傳統社會個體農戶的生產形態男耕女織是人民衣食的主要來源，上引《管子》，農具之外也述女紅。〈海王〉云「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輕重乙〉云「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鋸，然後成為女」。女紅器具和農具一樣，都是鐵器。鐵器尾隨編戶齊民進入歷史舞台，和齊民個體農戶是分不開的。

《管子》的鐵官之術還提到車輛所需配備的工具。〈海王〉曰：

行服連（輦）<sup>36</sup>輶輦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輕重乙〉曰：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鉏）、一鑽、一鑿、一鋸、一軻（柯），然後成車<sup>37</sup>。

斤鋸鑽鑿通常歸類於手工業生產工具，其青銅製品淵源甚古，等到製鐵技術逐漸精良後，鐵器可能也取代青銅，而成為車輛作坊的利器。不過就先秦文獻來看，成車之事並非專指作坊的製車工業，也與齊民小農息息相關。〈海王〉篇說「行服輦、輶、輦」，輦者輓車，輶者小車，輦者大車；輶是座車，其餘兩種都是平民行役服役的車輛<sup>38</sup>。拙作別文討論戰國時期編戶齊民徭役負擔之沉重（杜正勝 1990，頁405），故知齊民小農不但農事生產離不開鐵器，賦役應徵同樣要具備斧斤等鐵製工具。

36 《周禮·鄉師·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續為輦。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連輦古今字，《周禮》、《管子》皆作連。

37 孫詒讓云：「釭」，「鉏」之誤。丁士涵云：「軻」當為「柯」。《考工記》：「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注》：「首六寸，謂今剛關頭斧，柯，其柄也。鄭司農云：柯長三尺，謂斧柯。」則柯乃長柄之斧。參看《管子集校》頁1232—1233。

38 《左傳》襄公十年云：「輶重如役」。杜《注》：「步挽重車以從師」。重車即輶重，與加入戰場的革車不同。重車又稱作大車，《說文》謂之「輦」，與「輦」的分別在於一者駕馬，一者人輓。《周禮·鄉師》曰：「大軍旅會同，正始其徒役，與其輦輦」，則服輦輦，乃兵役以外的徭役。鄭玄《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輶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可資佐證。

輦、輦或輶也可作為貿易運輸之用。《史記·貨殖列傳》述通都大邑有「輶車百乘，牛車千兩」者，可比千乘之家，係指商販載運貨物的車輛。上述安徽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車節云楚國貴族鄂君啟蒙楚王之賜，獲得「車五十乘」的免稅優待，足見戰國時代商業愈發達，重車愈盛。車輛遠行，或清除道路障礙，或中途修補，每輛車都要準備斧斤鋸鑿等工具，也是消耗鐵器之一宗。

兵器當然也有鐵製品，唯不如我們想像的重要。戰國鐵兵器種類雖然不少，包括長兵之矛、戟、椎、殳、鈇、杖、鉤距，短兵之劍、刀、匕首，遠射之鐵矢，以及防身之冑、幕、鎧甲；然而當時新興的鐵兵尚不能取代擁有兩千年悠久歷史的銅兵。考古證明戰國鐵兵器之出土還是比較零星的，許多規模宏大的冶鐵作坊根本不鑄兵器，墓葬的銅兵比例猶比鐵兵為高<sup>39</sup>。有人認為直到戰國中晚期，鐵兵器在戰爭中使用的程度遠不及鐵農具在農業中普遍（何清谷 1985），大抵可信。

總而言之，鐵這項新資源在春秋晚期開始使用，戰國中期以下急速推廣，成為耕織合一的家庭及通都大邑商販不可或缺的東西。它和編戶齊民並存，與青銅器相形比較之下，尤其顯現它的平民性，故消耗量日益增大。

## （二）鹽鐵的經營和鹽鐵商人

鹽是日常的必須食品，而鐵乃生產勞動不可或缺的工具，這兩項資源關係民生如此之重，進入家庭如此之深，散佈民間如此之廣，戰國的政府有沒有好好掌握控制，是值得探索的問題。以鹽這種舊資源來說，政府怎樣介入鹽的生產，至今仍然是難解之謎。《史記·齊太史公世家》曰：「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國的商工之業與魚鹽之利是否可以推早到建國之初，並非毫無可疑（勞幹 1984）。即使當時齊領先諸侯，因順地利，發展商工，或是後世適應特殊地理環境而發展出獨特的經濟政策，政府如何「通」，如何「便」？是設關卡抽稅，或直接經營？由諸侯獨占？或貴族、平民亦可指染？這些問題都不易回答，而且恐怕也存在著多重的分歧情況。至於產鹽之晉，《史記·秦本紀》曰：

39 何清谷云，山東臨淄齊國故城發現煉鐵遺址六處，面積達九十餘萬平方米，未見一件兵器或鑄造兵器的遺迹。河南輝縣魏國冶鐵遺址多處，出土大量鐵農具及手工業工具，只在固圍村發現一柄鐵刀，尚不能完全肯定是兵器。許多遺址雖發現鐵兵器，但比並存之銅兵器仍少，如長沙清理的戰國楚墓209座，出土兵器182件，銅兵173件、鐵兵只有9件。常德德山清理44座戰國墓，出土兵器14件，銅兵13件，鐵兵只1件。鄭韓故城發現韓國兵器窖藏，全是銅兵器。參看何氏〈戰國鐵兵器管窺〉。

昭襄王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正義》曰：「掌鹽池之官，因稱氏。」則安邑河東鹽似乎是官營。其他則難考。

鐵是新資源，初用於封建崩潰之際，盛行於郡縣制集權政府擴張之時。當使用之初，在青銅文化的照耀下，可能不太顯眼；既難進入封建禮制的體系（考古發現極少數的鐵鼎），政府也許比較不關切，故相關的史料並不多。有人傾向於官營，主要證據有二：一是興隆燕國鑄鐵遺址出土的鐵范，鏹、鏹、斧、鑿四種范皆有相同的銘文（鄭紹宗 1956），早先史樹青、楊宗榮釋作「右畬」（1954），近年李學勤釋作「右廩」（1984，頁268）。史氏說，右者右工師，表示鑄鐵工匠的職位，畬者其名，此體例習見於戰國兵器題銘。李氏右廩無說，蓋指掌管糧食的官府。唯不論工師或糧官，都是政府的機構，顯見燕國這處鑄造農具的作坊是官營的。其次是秦國的證據。《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祖先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同時代的秦律記載評定官吏「采山」的績等曰：「大（太）官、右府、左府、右采鐵、左采鐵課殿，貲嗇夫一盾」（《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38）。左右采鐵當屬鐵官的部門，李學勤還徵引傳世「右冶鐵官」秦印來證明。然而戰國時期的冶鐵業是否如某些人所主張的主要由國家掌管（殷璋璋 1984），現有資料尚不足以判斷。

對於鹽亦然。若按《史記·貨殖列傳》，戰國時代倒出了不少煮鹽和冶鐵的大商人，不但財力雄厚，也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太史公首舉

猗頓用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猗頓，《孔叢子·陳士義》云：猗頓魯之窮士，問致富之術於陶朱公，「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孔叢子》學者向來認作偽書，不敢輕信（張心澂 1957，頁744—751）。唯猗氏縣河東鹽池所在，自春秋以來既已馳名（《左傳》成六杜《注》），猗頓以此起家，亦合情理。太史公繼范蠡、子貢、白圭等穀糧商人之後，首述猗頓，其生存年代可能在戰國前期。《孔叢子》傳說亦不可完全抹殺。較之後來齊國鹽商刁間，猗頓販賣的是池鹽，刁間則煮海鹽。猗頓私營鹽業，上述鹽氏有公營鹽場，那麼即使同在河東地區，鹽鹽之業可能是公私營並存的。

冶鐵的邯鄲郭縱，其人無考，據史遷序列，似亦較早的人物。《貨殖列傳》所述冶鐵大賈多在秦滅六國之際。如蜀卓氏，祖先趙人，用鐵冶富，西元前228年秦攻破

趙，遷卓氏。不爭鄰近中原的漢中，遠致蜀南臨邛，「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臨邛還有程鄭，其先人亦山東遷虜<sup>40</sup>，「冶鑄，賈椎髻之民，富與卓氏埒等。」第三家冶鐵大商人是南陽孔氏，原本梁人，「用鐵冶爲業」，西元前225年秦伐魏，遷於南陽，大鼓鑄，通商賈之利，致富數千金。卓、程、孔三家，至少卓氏與孔氏，《史記》明言在遷徙之前都已經營冶鐵，販賣鐵器而致富。據今日考古資料，其先之興或不早於戰國中期。然而累世之富，隱隱然形成一股社會力量，故遭遷徙（參馬非百 1982，頁916）。這些冶鐵資本家的祖先在六國固可私人經營冶鐵，入秦之後，雖秦有鐵官，亡國遷虜的身分並不妨害他們的事業。可見冶鐵和煮鹽一樣，官營私營並存。

鹽鐵「權利之處」，誠如桑弘羊說的，「必在深山窮澤之中」（《鹽鐵論·禁耕》），這是農田以外的土地，古書通稱作「山林川澤」。煮鹽冶鐵之經營，還要從山林川澤的占有使用來考察。

古代山林川澤最後所有權是屬於聚落公有或統治者私有，難溯其原，目前的研究假設性仍高於實證性。唯所有權牽涉統治權，固不可能單獨存在，亦不可能一成不變，它和統治權力之伸縮消長相輔而行，所以也有地區性的差異。至少到了周代，人民仍然有享用山林川澤的權利，不過須受季節的限制，謂之「時禁」。《周禮》〈山虞〉曰：

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另外〈林衡〉〈川衡〉〈澤虞〉〈山人〉亦就其所職掌的資源按時開放，按時禁止。

《周禮》雖是一部爭議的書，但關於山林川澤資源的享用卻與《逸周書》、《孟子》、《荀子》、《國語》、《禮記》和新出秦律不謀而合<sup>41</sup>，應當可信。關於礦藏，《

40 〈貨殖列傳〉曰：「程鄭，山東遷虜也。」似程鄭值秦政統一六國之時從山東遷於臨邛者。然考《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曰：「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臨邛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程鄭當與相如同時。《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文帝二年立，孝王三十五年崩，即孝景中元六年（西元前144），上距秦政統一（西元前221）已七十七年。故本文謂程鄭先人從山東遷於蜀。

41 《逸周書·大聚》述夏禹之禁曰：

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

遲至戰國末年嬴秦〈田律〉猶曰：

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隄水。不夏月，毋敢夜（掖？）草爲灰，取生荔（甲？）

《周禮》亦有說，〈司人〉曰：

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

礦產亦有開放民採之時，與山林川澤的「時禁」類似。

隨著政治發展，君權升高，山林人民公有的慣例逐漸遭到剝奪，統治者企圖獨占，雖名「國有」，其實是君主私有。譬如齊國在景公時（547 B.C.—490 B.C.），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左傳》昭二十）。

原來人民可以享用的權利都「國有化」了，人民詛咒景公，晏嬰乃勸之「去禁」而施惠（《左傳》昭二十）。所謂「去禁」，即「山林陂澤，不專其利」（《晏子春秋·問上》），與民共之。也許恢復古代的時禁傳統，也許進而開放給人民開發，長期利用。據說孔子向魯哀公建議「廢澤梁之禁」（《說苑·指武》），孟子則明白主張「澤梁無禁」（《梁惠王下》）。廢禁、無禁似乎都比時禁更進一步，有如「梁惠王廢逢忌之藪以賜民」（《古本竹書紀年》）之意。古書也稱作「弛苑囿」。不論廢或弛，都不是全面性的。早在景公去禁之前六十六年，齊頃公曾經「弛苑囿」（《史記·齊太公世家》），他所弛的苑囿當然也不全面。戰國時期人民享有山林川澤使用權利的過程是複雜而曲折的，即使如此，這種轉變仍然造就了「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麋，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史記·貨殖列傳》）等等無數的素封之士。同時雄豪之家獲得權利之地，便可煮鹽冶鐵，成爲鹽鐵商人。

戰國承接封建餘緒，還殘留一些老傳統，先前封建貴族采邑內的山林川澤即其一端。到戰國時代他們的子孫如何利用傳統權益，須從采邑的山林川澤說起。

），麇卵穀，毋口口口口口口毒魚鱉，置穿罔（網），到七月而縱之（《睡虎地秦墓竹簡》頁26）。

《周禮》〈司人〉曰「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雍氏〉曰「禁澤之沈者」，鄭司農云：沈者謂毒魚及水虫之屬。律文前半與（禹禁）相通，後半殘蝕，參用《周禮》才易理解。七月解除網罟入於川澤之禁。孟子再言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梁惠王上》），即秉「時禁」的傳統；荀子亦曰「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斬伐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王制》）。《禮記·月令》設計的禁忌，恐亦由時禁傳統衍生出來。從春秋中葉魯大夫斷宣公之網罟來看（《國語·魯語上》），時禁所禁者並不限於平民，即使貴爲國君，也不例外。相對的，不在禁止的季節，山林川澤人民應該有權利用，《禮記·王制》故曰：「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封建時代諸侯的封疆有他們直轄的土地，也有再分封給貴族的采邑，大采邑便可能包含山林川澤，西周和春秋的文獻皆可證明。近年陝西董家村新出九年衛鼎云，矩伯以其采邑林胥里與裘衛交換車馬飾。該里在顏林中，顏林是顏氏貴族的林地，主人叫顏陳，其妻顏姒，有家臣曰壽商。里有四封，則顏林的範圍必不小（龐懷清 1976）。傳世冊生簋記錄格伯典給棚生三十田的田界，自某谷杜木經某谷桑林，涉東門（《大系》頁64）。此三十田只是格伯采地的一部分，所鄰接的川谷林木，當在格伯全部采邑的範圍內。春秋時期，如魯國孟孫家臣謝息向正卿季平子要求山林地，季孫「與之萊、柞」二山（《左傳》昭七）。齊國大族田氏取悅人民，「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左傳》昭三）。平價出賣的林木魚鹽當然是田氏采邑內山林川澤的產物。封建貴族采地內的山川林場是否在非時禁的季節也開放給領民，共享其天然資源？史籍雖然無徵，但從田氏討好人民的方式，物產不加價，領民已感莫大恩惠，當然不敢指望享用。采邑經過分封之後，到底是貴族私有的財產，非人民之公物。而且封建貴族運用封域內的地利發展工商，春秋時代頗多所聞。田氏之外，齊國的慶氏也是一例。西元前545年的政爭中，「慶氏之木百車於莊」為人所奪（《左傳》襄二十八）。莊是六軌大道，也是交易的「達市」（杜正勝 1980）。此百車之木當是慶氏山林之產而販售於臨淄者。

齊國濱海，產海鹽，晏嬰說國君使祈望監守海邊之鹽蜃，是齊侯從事魚鹽貿易，但非完全壟斷，貴族凡有濱海之封邑可以煮鹽者，大概都不會放棄發財的機會，唯田氏以平價收買民心，故傳諸史冊。同時在盛產池鹽的河東地區，晉國貴族領有鹽池者也以此致富。西元前585年，

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左傳》成六）。

杜預《注》：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其地近於猗氏縣的鹽池。貴族爭相主張遷都郇城，想必可以封山占澤，專享其利，當時公室趨弱，無所得益，故新任中軍將的韓獻子站在中央政府立場反對，終於遷到農業區新田。鹽池之地遷都不成，仍為強大貴族所封佔，當時勢如中天之日的郤氏可能是其中之一。晉國三郤氏的郤犇，「食采於苦，號苦成叔」（《潛夫論·志氏姓》）。秦嘉謨《世本輯補》曰：「苦成氏，晉郤犇食采苦成，因氏焉。苦成，城名，在鹽池東北。」鹽鹽之鹽，杜子春讀

作「苦」(《周禮·鹽人·注》)。所以有人考證卻犇領有鹽池，採鹽販賣，勢力於是壯大(增淵龍夫 1960，頁307)。其多財自在意料中，雖不必如封於溫的卻至「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那麼「富寵」(《國語·晉語八》)。

古代從封建轉為郡縣制的過程中，一方面固然是平民的崛起，另一方面也是某些貴族取代另外一些貴族的地位；換句話說，是封建貴族的轉化，而非全盤的沒落。在轉變的過程中，貴族後裔仍然享有傳統采邑的利益，即使喪失政治權力、逐漸夷為平民者，猶不失為地主。采邑若有山林川澤，更能因緣地利，發展工商，成為新的財富階級。(貨殖列傳)的鹽鐵大賈雖無從推溯其家世，然當時鼓鑄煮鹽之輩當不限於此區區數家。傳統貴族後裔既先擁有地利，又可能具有比較富實的資本，發展鹽鐵企業應比純粹從平民竄升者容易。王夫之《讀通鑑論》便有很敏銳的觀察，他說：

富豪大族之所以強者，因其地也。諸田非渤海魚、鹽之利，不足以強；屈、昭、景非雲夢澤藪之資，不足以強(卷二)。

秦漢時代指斥的豪強或豪民很多是佔有山林川澤之利的貴族後裔，其大利所在則是鹽和鐵。

### (三)《管子》的鹽鐵政策

綜合考古出土資料、先秦文獻關於鹽鐵大賈的記載，以及山林川澤等土地的權屬和利用，戰國時代鹽鐵之經營可能是政府與民間並存的，以控制比較嚴格的秦國來說，國營冶鐵的證據比較多，商鞅變法主張「壹川澤」(《商君書·墾令》)；董仲舒說他「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漢書·食貨志上》)。但所謂壹、專或管，據桑弘羊說是採取收稅的方式(《鹽鐵論·非鞅》)，而非政府完全壟斷經營。所以山東冶鐵大賈被遷徙後，仍能在新地操舊業。至於列國，殘存資料不多，(貨殖列傳)的鹽鐵商人多出於山東地區，六國政府對他們似乎採取更寬容的放任政策。

鹽鐵商人雖然不具獨占性，唯其生產品為廣大人民群眾所不可或缺，而開發生產必需龐大資本，所以事實上具有相當的壟斷性。當時只有政府能與之頡頏，但官府經營工業效率多不彰，故戰國計臣乃籌思壓抑鹽鐵商人的對策。《管子·輕重》諸篇保存一些鹽鐵政策的議論，實行的程度不明，但基本態度與漢武帝大相徑庭。這是我們反對把《輕重》諸篇定在西漢的原因之一。

列國財經之士發現糧商操縱物價，乃運用各種輕重手段以壓抑之。鹽鐵之利他們

亦有所認識，〈揆度〉曰：

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郭沫若云，「動左右，以重相因」，謂衡（天秤）也，以衡喻輕重之術（《管子集校》頁1169），即善操輕重，國有二十倍之利。鹽鐵政策亦納入整個輕重系統考慮，計臣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採用附加稅。附加稅徵收鹽利，〈海王〉謂之「正（征）鹽策」。其論曰：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曆也。

吾子，尹知章《注》云：小男小女。上節論古人食物多醬醢，馬非百引《漢書·趙充國傳》曰：「凡萬二千八百一十一人，用鹽三百八斛」，計每人每月用鹽二升九合強，比〈海王〉的吾子稍多，比大女少，相差大男更遠（馬非百 1979，頁195）。五升少半云云的確太多，唯〈海王〉下文的總估計只取三升，與趙充國的核算吻合，頗能準確地反映社會的實情。日常食鹽消耗量既然這麼大，政府乃以附加稅的方式增加收入。〈海王〉曰：

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禺（偶）策之，商（適）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sup>42</sup>。

「分疆」，分，半也；疆，或讀為緝，錢也，或曰附加之價曰疆（《管子集校》頁1041）。茲以一升鹽加價二錢計，平均每月每人食鹽三升，萬乘大國的政府可得附加稅六千萬錢。有了附加稅，便不必直接向人民征歛。〈海王〉說：「萬乘之國，正（征）人（原作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藉，為錢三千萬。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藉者六千萬。」於是可以免於人民之「囂號」抱怨，計臣認為這是最高明的稅制。

另一種鹽策是禁止私人煮鹽，國家統籌管制，再以所產之鹽行輕重之術。〈地數

42 禺，尹知章云讀為偶。安井衡云：合也。郭沫若讀為偶然之偶，「偶策之」，猶嘗試算之。商，于省吾云「商」應作「商」，適也。參《管子集校》頁1042。

）曰：

君伐菹（菹）薪，煮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令〕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價）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價）脩（循）河濟之流，南輸梁，赴宋衛濮陽。……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sup>43</sup>

。

禁北海之衆聚庸煮鹽，目的在維持一定的生產量，使國鹽得以長享優厚的利潤。由於日常「惡食無鹽則腫」（〈地數〉），產鹽之國便可以鹽賺取外國金錢。國君如何伐菹薪煮鹽呢？〈輕重甲〉有類似於〈地數〉的記錄，今據《冊府元龜》卷四九三引《管子》校正，意思更明白。曰：

今齊有渠展之鹽，諸君伐菹（菹）薪，〔使國人〕煮水爲鹽，正而積之。

《冊府元龜》多「使國人」三字，正說明政府對鹽產的管制並非直接經營，而是以山林川澤之專利租給人民開發，政府不征錢而征鹽，再累積大量食鹽從事貿易。爲保證國家貿易必定獲利，大概主要的鹽產多流入政府的庫藏。但這種管制方式是否實行，亦不無可疑；否則，齊國那能產生刁間那種大鹽商？實際情形恐怕還是人民「聚庸煮鹽」的吧。

關於冶鐵，〈地數〉有封山之令，見山上有赭者，下必有鐵，於是謹封之，「有動封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政府封占鐵山，固爲壟斷資源，由政府開採或採取某種管制方式，但這是建議，而非公佈的律令。我們在別篇看到計臣明白反對政府直接經營冶鐵工業。〈輕重乙〉曰：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

。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七（原作

十），君得其三；有雜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政府如果直接經營冶鐵，以刑徒爲主要勞動力，採礦運輸等作業過程中都有流亡的可能；若徵發民徭服此苦役，人民怨恨，一旦戰爭便不賣力，對國家皆無好處。故計臣主張冶鐵民營，政府課稅，鐵器製品十分之七存於民間商人，十分之三由政府掌握。政府所占者少，民間流通者多，按輕重的原理，是很難重射輕泄、守高準下的。此議

43 脩，循之誤，參《太平御覽》865引，及王念孫、俞樾說。「天下不減矣」，張佩綸曰，當依〈山至數〉篇作「天下不吾洩矣」。參《管子集校》頁1156。

恐怕也成為空談。對政府比較有利的還是〈海王〉的附加稅方式。〈海王〉曰：

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耜鐵之重加十（原作七），三耜鐵一人之藉也。

一針加稅一錢，按正常征斂，人藉三十錢，則三十針的附加稅等於一人的征藉。刀、耜準此。女工不離針刀，農事不離耜鉞，行役商旅之車輛不離刀鋸，編戶齊民既然和鐵器分不開，計臣認為對民生必需品開徵附加稅，是佐助國家財源的妙方。

然而附加稅要切實有效，政府必須先徹底掌握貨物的流通，事實上這也是不可能的。以附加稅的辦法最後還是空論。即使這種稅制實施了，商賈轉嫁，羊毛出在羊身上，受害最深的還是消費者，也就是廣大的齊民小農。誠如上論，鹽鐵關係編戶齊民的生活和生產，一日不可或離，富賈豪民既能佔有天然資源，經營鹽鐵，於是控制民生必需物質，剝削齊民小農僅餘的利潤。他們擁有很大的活動空間，政府眼睜睜看他們獨享大利而無可奈何。這是戰國經濟繁榮的本質，也埋下統一帝國時期政治力量打擊商人的因素。

## 五、結 語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云，越既破吳，范蠡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他可以稱得上是一位農業資本家。後來去海濱，「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唯范蠡先前在海濱耕田時，想必已採行廢居候時的輕重術，才可能在短暫時間內致富。當然，輕重術運用巧妙要到天下貿易中心的定陶（史念海1963，頁110）才發揮極致，但他們仍過著「父子耕畜」的刻苦生活。

〈貨殖列傳〉特別稱述范蠡散財，而不及其自勵。事實上輕重商人躬與苦役者猶大有人在，如云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曹的冶鐵巨富邴氏「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宣曲糧商任氏的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皆可以互相媲美。他們治家的精神也和治產的手段一樣，都是范蠡的遺傳，可惜欠缺散財的觀念與品德。

早期另一位輕重商人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貨殖列傳〉）。據說有一次造訪「空室蓬戶」（〈游俠列傳〉）的同學原憲，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莊子·讓王》），可見他習慣於饒益貴麗的生活。本文開篇說，戰國的新富由富而貴，有錢自可養尊而處優，〈貨殖列傳〉所述冶鐵商人孔氏最稱典型。他們「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當政治腐化時，商人藉豪奢的排場更方便作生意，故「其贏得過當，愈於織畝」，不必靠細碎節儉的方式累積財富。孔氏作風在當時頗為普遍，太史公說「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然而不論豪奢或儉嗇，那只是輕重商人個人的作風，對整個編戶齊民的社會而言，他們運用輕重之術，操縱市場，壓榨廣大農民的剩餘利潤卻無二致。據董仲舒說，輕重商人有的從事土地兼并，田連阡陌，貧農遂無立錐之地；有的「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煮鹽冶鐵。自春秋中晚期以降逐漸形成的齊民社會不斷遭受這些經濟力量的腐蝕，結果是「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漢書·食貨志上》），法律身分齊等的平民，社會經濟地位卻大大不齊。

董仲舒在西漢前期觀察到的社會弊病，其實多是戰國社會的延續，近代有些人不查，只知有漢，不知有先秦，把戰國社會遺傳給西漢的流弊統統歸作西漢的現象，於是也將先秦著作劃入漢代，《管子·輕重》諸篇就是典型的例子。這樣不但疏忽仲舒「漢興循而未改」的話，對西漢前期社會的癥結也找不到合理的解答。本文以《史記·貨殖列傳》為骨幹，從歲星占年分析《越絕書》和《管子·輕重》的輕重術，並輔以今日考古知識，拈出「輕重」，希望可以說明戰國二百多年社會經濟的一些關鍵問題。

一九八七年夏初稿

一九八九年秋修訂



## 書 目

- 于省吾 1963 〈鄂君啟節考釋〉，《考古》1963年8期。
- 于省吾 1977 〈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8期。
- 王夫之 《讀通鑑論》，河洛圖書出版社。
- 王世民 1984 〈東周時期金屬鑄幣的發現〉，《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 王先謙 《漢書補注》，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
- 王利器 《鹽鐵論校注》，世界書局重印。
- 王增新 1964 〈遼寧撫順市蓮花堡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4年6期。
- 王獻唐 1979 《中國古代貨幣通考》，齊魯書社。
- 史念海 1963 《中國史地論稿》（河山集），三聯書店。
- 史樹青 1954 〈讀一九五四年第九期「文參」筆記〉（與楊宗榮合寫），《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12期。
- 任乃強 1986 《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
- 伊世同 1981 《中西對照 恆星圖表》，科學出版社。
- 朱 活 1984 《古錢新探》，齊魯書社。
- 巫寶三 1984 〈管子輕重學說的淵源、基本思想和基本概念〉，《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集刊》1984年7期。
- 何清谷 1985 〈戰國鐵兵器管窺〉，《史學月刊》1985年4期。
- 佟柱臣 1983 〈二里頭文化和商周時代金屬器代替石骨蚌器的過程〉，《中原文物》1983年2期。
- 杜正勝 1980 〈周秦城市的發展與特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1本4分。
- 杜正勝 1988a 〈中國古代的資本家〉，《歷史月刊》創刊號。
- 杜正勝 1988b 〈關於《管子·輕重》諸篇的年代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9本4分。
- 杜正勝 1990 《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聯經出版公司，1990。
- 李學勤 1984 《東周與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

- 胡家聰 1981 〈管子·輕重作于戰國考〉，《中國史研究》1981年1期。
- 胡寄窗 1962 《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 俞 樾 《羣經平議》，收入《皇清經解續編》卷1362—1396。
- 殷璋璋 1984 〈有關冶鐵工藝興起的考古發現〉，《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 殷滌非 1958 〈壽縣出土的鄂君啟節〉(與羅長銘合作)，《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
- 容肇祖 1958 〈駁馬非百“關於管子輕重篇的著作年代問題”〉，《歷史研究》1958年1期。
- 唐 蘭 1960 〈中國古代社會使用青銅農器問題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總2期。
- 徐中舒 1980 〈西周利簋銘文箋釋〉，《四川大學學報》1980年2期。
- 梁玉繩 《漢書人表考》，臺灣商務印書館。
- 馬非百 1956 〈關於管子輕重篇的著作年代問題〉，《歷史研究》1956年12期。
- 馬非百 1979 《管子輕重篇新詮》，中華書局。
- 馬非百 1982 《秦集史》，中華書局。
- 商承祚 1963 〈鄂君啟節考〉，《文物精華》第二集，文物出版社。
- 崔 述 《洙泗考信餘錄》，收入《崔東壁遺書》，河洛圖書出版社。
- 張心徵 1957 《偽書通考》三版修定本，商務印書館。
- 許倬雲 1978 〈漢代的精耕農作與市場經濟〉，《屈萬里先生七十榮慶論文集》，聯經出版公司。
- 郭沫若 1956 《管子集校》(與聞一多、許維遜合著)，科學出版社。
- 郭沫若 1958 〈關於鄂君啟節的研究〉，《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4期。
- 陳良佐 1984 〈我國古代的青銅農具〉，《漢學研究》2卷1期、2期。
- 陳遵媯 1982 《中國天文學史》第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久金 1978 〈從馬王堆帛書《五星占》的出土試探我國古代的歲星紀年問題〉，《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科學出版社。
- 陳振中 1980 〈殷周的耒耜〉，《文物》1980年2期。

杜 正 勝

- 陳振中 1981 〈殷代的銍艾〉，《農業考古》1981年1期。
- 陳振中 1982 〈殷周的錢鏹〉，《考古》1982年3期。
- 勞 幹 1984 〈論齊國的始封和遷徙及其相關問題〉，《食貨》14卷7、8期。
- 梁啟超 1936 《墨經校釋》，中華書局。
- 高 亨 1974 《商君書注釋》，中華書局。
- 黃展岳 1976 〈關於中國開始冶鐵和使用鐵器的問題〉，《文物》1976年8期。
- 楊 寬 1980 〈我國歷史上鐵農具的改革及其作用〉，《歷史研究》1980年5期。
- 雷從雲 1980a 〈戰國鐵農具的考古發現及其意義〉，《考古》1980年3期。
- 雷從雲 1980b 〈三十年來春秋戰國鐵器發現述略〉，《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0年2期。
- 鄭紹宗 1956 〈熱河興隆發現的戰國生產工具鑄範〉，《考古通訊》1956年1期。
- 羅根澤 1931 《管子探源》，中華書局，後收入《諸子考索》。
- 錢 穆 1956 《先秦諸子繫年考辨》，香港大學出版社。
- 劉仙洲 1963 《中國古代農業機械發明史》，科學出版社。
- 瞿曇悉達 《唐開元占經》，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113，臺灣商務印書館。
- 龐懷清 1976 〈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與吳鎮烽等人合寫），《文物》1976年5期。
- 饒宗頤 1985 《楚帛書》，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 增淵龍夫 1960 《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弘文堂。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56 《輝縣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 1978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星占》釋文〉，《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科學出版社。
-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81 《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
- 《考古學報》
- 1975年1期 〈河北石家莊市市莊村戰國遺址的發掘〉
- 《文物》
- 1985年4期 〈銀雀山竹書《守法》《守令》等十三篇〉

# 對於“戰國的輕重術與輕重商人”的意見

勞 榘

本篇討論的是古代中國的一種經濟理論，是一篇很好的論文。所謂“輕重術”，是一種法家的經濟政策，目的是在基礎站立在政府的立場上，怎樣控制貨幣，使商人就範，而達到增加政府的財富，並且增加政府的威信的雙重目的。這種思想是以管子為其中的代表。但管子雖然號稱管仲所著，實際上是有問題的。管子是不在一時，也不是一人的著作。就其中“輕重篇”來說，近代諸學人已經有不同的意見，而且很多的人，認為是漢人的著作。這些看法卻失之過遲。本篇作者杜正勝先生定為戰國中期（原稿第五葉）是正確的。只是杜先生認為齊國的作品，我卻認為“輕重篇”的作者只是以管仲做一個立論的幌子，是否都是齊人所作，當不一定可以論定。

史記齊太公世家，因為當時史料已經不夠，許多地方都是錯的。除去把太公說成東海的平民，不合實際情形以外，說到太公封齊就國，太公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以及漢書食貨志說太公作九府圜法，等等，都是模糊影響，牽強附會之說。太公以后父之親，指揮周師，鷹揚牧野，為周室建國功臣之首，這是事實，不過周克商後，太公已老，當武王歿後，主少國疑，二叔流言之際，全倚周召主持大局，不聞太公有所建白。可見太公在武王歿前已死，此項數年短短時間，決來不及經營初定的齊國。而況周公實未就國於魯，召公亦不曾就國於燕。太公以王室懿親，亦不可能老年遠徙。太公開創齊國工商，自是一種傳說。同樣的，管仲相桓公，其政績當在政治，軍事及外交方面，對於經濟方面，在左傳中並無多少涉及。左傳寫成當在戰國初期（我想是吳起之子吳期寫成的），對於管仲的經濟政策，並沒有什麼描述，到了戰國中晚期，至少在李悝的表現普遍化以後，做經濟管制的人，已有不少資料，想找一個“輕重術”的祖師，於是把管仲抬出來。至於計然（或計侃）這位范蠡的顧問，大約也是一個虛構的人物。他是突然出現，只替別人作謀主，身世不詳，不像一個真的人物。

計然這部書，不見於漢書藝文志<sup>1</sup>，也就表示著在西漢晚年到成帝時，中秘並無這部書。史記貨殖傳提到計然，所引計然學說和越絕書所引略同，這是越絕書所據的，是這部書採自史記，而不是史記採取這部書。至於史記的根據，現今當無法知道，因為司馬遷當時看到的，現在很多無法看到。至於所謂“計然”這部書，除去越絕書所載以外，據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出來的，還有許多物產的名目，並載有產地，而這些產地，又都是漢郡，並且還有不少漢武帝以後才設置的漢郡。也可看出這部書成書較晚。既然“計然”這部書成書較晚，也當然可以利用歲星的星占，不成問題。至於史記貨殖列傳所引，時代較越絕書為早，但史記所引可能也是戰國晚期的材料，不能證明春秋中晚期已有。（即使司馬遷確看到了“計倪內經”，而這部書仍是戰國中晚期以後的著作）。此外，我也相信，其中意義不明的論點，可是還是爲了民間投資，不是爲了政府政策。

白圭只有一個，亦即與孟子同時的白圭。他的時代是比較范蠡，子貢晚的很多，而且比較魏文侯時的李悝，也晚的很多。史記說“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應當是正確的。其實在白圭以前，成功的商人，是不能悉數的，決不僅僅只是范蠡和子貢。只是范蠡是越國的大臣，子貢是孔門傑出弟子，范蠡子貢雖然都成爲大商人，但被人稱引，卻因其還具有別的身分，知名度較高而已。所要注意的，仍是無論什麼時代，都可產生成功的大商人，這些商人只是憑著經驗和銳敏的觀察能力來預測市場的漲落，不一定都根據成系統的理論。論語所稱“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當然是說“子貢不願做公務員，而寧肯去做商人，爲的是他預測市場的漲落，往往是正確的。”這種在早期的看法中，如司馬遷，如王充，不受任何偏見的歪曲，所說當然是正解，至於邢昺甚至到了崔述，那就是曲解了。我們要指出的，是子貢的成功，本來未根據理論的指導，而且也未曾有人把理論附會到子貢身上去，情形簡單些。至於范蠡，其人比子貢更爲多采多姿，有人把一些理論附會到范蠡身上去，並且還構想一個理論家“計然”上去。使得范蠡的生平，更爲戲劇化。不僅如此，在理論再加上戰國時代占星的技術，及“輕重”的理論。關於“輕重”的理論，似乎是白圭是一個關鍵人物。這種輕重再加上占星，似乎決不可能早於白圭，應當是可以斷定的。

1 漢書藝文志兵家卻有“范蠡”二卷，也可能即是“計倪內經”，還有談兵的部分，已經亡去。不過，這個可能性不大，尤其是“計倪內經”決不可能是春秋時期的遺著，而屬於戰國時人的依託。

戰國中晚期是思想的進展和經濟的發展同時並進的時代。其中經濟的成長幫助了思想的進展，而思想的進展又可以促進經濟的成長。但從另外一方面看，經濟的開展又是隨著政治力量的增進使得領土擴張，而跟隨著壯大的。然後經濟力量再做思想供養的後盾。但是卻有一個限度，等到政治成為一元化時，那就反而阻礙了思想的進展。從戰國初期到秦的開始，恰恰走的就是這條路。

從漢代人口集中地點來看，應當人口最多的區域，也就是財富集中的區域，應當是當今的河北的南部，河南的東部及北部以及山東的西部，黃河三角洲的大平原<sup>2</sup>，而大梁，鄴，邯鄲，和陽翟是其中的重點。臨淄，安邑以及洛陽，也都是人口集中的中樞，但都是位置到一個小的區域，不似大梁邯鄲間是全中國的中心地帶，究竟不能常期成為思想的中心區域。在春秋時代晉國僻處山西南部，漸次的把勢力移向黃河三角洲，控制了當時華人世界的經濟中樞，隱然有領導羣倫的形勢。只可惜春秋晚期，晉國的發展到了巔峯，而晉國的內政卻陷於分裂。到了三家分晉，魏國控制了故晉重要部分的領土，馬陵戰前，魏國確有資格成為全國的中心。此時在思想方面，可能影響到的，一方面是為了經濟上的客觀條件，希望大一統的出現，另一方面因為過去封建的貴族制度，已經不僅失掉了作用，並且還是國家行政上的阻礙，也希望提高王權。在許多客觀因素中，法家就已經成為當前的需要。

在這個期間，除去李悝，申不害，以及吳起為顯著的法家而外，其中最重要一部，有關制度的法制寶典，“周禮”，也應當在戰國初期與中期之間產生。周禮，實際上是一個外儒內法的著作。所代表的是統制經濟而不是自由經濟，其思想的出發點，和管子的立場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周禮和管子是相表裏的，現在雖然不明瞭它的地域性，卻可以說出它的時代性。

管子原來是由許多單篇的論著集合成功，變了一個總集，當然非一人所作，而且也非一時所作。只是其中的立場還是大致相近的。管子中含有不少的占星術及陰陽五行成分，這可能是齊人習俗，雖不見全部是稷下的談論，卻很可能與稷下有若干關聯。但就時代來說卻可能比稷下時期晚，而到了戰國之末。不過無論如何這許多篇還是先秦的，不會晚到漢代開國以後。尤其這許多篇是司馬遷，桑弘羊，桓寬諸人已經看到

2 參看史語集刊第五本，勞幹：“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所附的“西漢地理志圖”。在這一帶是西漢人口密度最高之區，這種人口集中的情形也一定由戰國時期接替而來。



過的。(上文已經說過，不一定會全是齊國人做的，依照當時風氣，出於齊人之手的可能還是只有一小部分。)

司馬遷對於保存以及整理古代的史料，其功績要算得古今以來最重要的一個人。他對於思想史的功績也非常大。不過他對於學術的流派卻不免有許多錯誤的看法。他做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歸入道家系統裡，這是因為他看到韓非做了“解老”和“喻老”兩篇所引起的幻覺。其實從源流來說，早期法家或者和儒家的關係更深些。在孔門弟子之中，思想方面，早已顯出分裂的現象。其中顏淵早卒，而弟子中如有若，子夏等似乎和後起的曾子，早已不協。論語中的“參也魯”<sup>3</sup>，似乎就是和曾子敵對派別中毀謗之辭。在禮記檀弓上，曾子指斥子夏，孟子中更有孔子沒後，諸弟子有人想以有若為孔子繼承人，經曾子反對，才打消此議。依論語所載，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這是認為“組織”是道德的基本。而曾子卻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這不是以組織為基本，而是以道德的認識為基本。從這兩個不同的方向伸延下去，曾子這個學派遞傳到孟子，以及大學和中庸，成為儒家正統的支柱。而其他學派，包括後來的荀卿在內，並未做到。

孔門四科之中，政事是其中的一科。對於政事的處理，並不一定要先有一個理論基礎，而是一些理論是從當時當前的政策需要，歸納出若干原則出來。就近景來說，是把所服務的國家處理好，就遠景來說，小規模的成就，是富國強兵，就大規模來說，是齊同天下。所以其中的理論基礎，只是為治理而治理。在古代君權時代，當然的最後結論是只要鞏固了君權，就是道德的，這就是法家產生的原則。依照有子的最高原則，是避免“犯上”和“作亂”。循這原則下去，就會有一部分人轉到法家思想上去。只有循著曾孟的軌道，才會得到對暴君有“草芥寇讎”的結論。但孟子所有的認識和設計，仍是不夠成熟的。也就使得法家的經濟政策，可以自成一套，而孟子系統下的經濟政策，雖然不是向統制方向邁進的，可是也不能自成一套。

在春秋時代，依照左傳所記述的，各國的經濟設施，都是隨事來應付的，並無一定的方針，和一定的計畫。但是為了春秋時代，產業的形態，正在逐漸蛻化之中，到

3 魯字一般注家皆釋為“魯鈍”，這是不切實際的。曾子是聰明蓋世的人，怎麼可以魯鈍？所以魯字可能是魯莽的意思。曾子年最少，其父曾點又有些放蕩不羈。在曾子初年可能有些魯莽，正與“師也辟，由也諺”，同指生活習尚，不指智慧。

了戰國初年，已經差不多定型化。就當時的客觀需要來說，法家的政策，正合於當前局面的要求。照此推衍下來，統制經濟的設計程式的出現，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其實統制經濟永遠是一個失敗的窮途，這是現代新發現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年，大家還不知道。梁啟超是一個相信民主政治的人，但他的中國六大政治家，列舉了管仲（這不是真的管仲），以及王安石，一點也不覺得矛盾。在戰國，西漢，以及北宋的思想家，又怎樣能了解這種非常複雜的事實？<sup>4</sup>

在漢書藝文志中，儒家有李克七篇，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顏注，“李克，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又顏注“李子，名悝，魏文侯（相），富國彊兵。”王先謙補注：“今案李悝為律家之祖，三十二篇則其自著書。”近世學者多以為李克即是李悝（克與悝聲均上可通），李悝不僅為“律家之祖”，其“盡地力之教”也是法家經濟理論的創始者。至於著述中，有儒家言，也有法家言。這就是他作儒家言時，收作儒家，他作法家言時，收入法家的原故。儒法可以互變，如賈誼傳言賈誼的學術傳授，是：荀卿—李斯—廷尉吳公—賈誼。其中有法家，有儒家，傳授不是十分固定的。（其中疑問是史記吳起傳稱吳起曾就學於曾參，這一點卻不能認為曾子之說某一部分接近法家，因為吳起並非曾子的忠實弟子的原故。）

本篇作者杜正勝先生認為“輕重術”是一種政府剝削商人的辦法，也就是法家集權統治的一方面。這個見解是十分正確的。只是我的見解是認為法家成為一個系統的思想，要從李悝開始。在各種經濟思想中，不論管仲，范蠡或者計然的思想，都是李悝的法家思想樹立以後，才再由戰國初期與中期間的學者伸演而成的。時代要比李悝晚些。

此外，本篇對鹽鐵論引據王利器的鹽鐵論校注，此書所有的校文，都是根據我在史語集刊第五本的“鹽鐵論校記”。他並未找到了一種另外的宋明刊本。但他書中對於“鹽鐵論校記”不提一字。這可能是他在大陸，有所顧忌的原故。不過為求真起見，我卻應當藉此聲明一下。

再次，有關於李悝的問題。李悝不僅為律學之祖，而且也是法家之祖。關於成文

4 這裡牽涉到周禮的問題。周禮的時代，應屬於戰國初期，其所敘九州，豫州領有華山，表示在馬陵之戰以前，中國中無巴蜀（禹貢就有巴蜀），表示在秦惠王滅蜀以前。此書包含古代史料甚多，所以可貴。不過照周禮實行的，無不失敗。這就因為周禮的經濟方向，是一個澈底的統制經濟，由官僚制度來執行。沒有可能免於失敗的。

法問題，只從李悝法經開始，中國才有正式的成文法。以前雖有鄭的刑書，晉的刑鼎作爲基礎，但其完密和系統化當然不如李悝法經。從此以後，影響到秦法和漢法，而成爲東方法系的創始者。從李悝的貢獻來比較，那就尚書呂刑篇的“五刑之屬三千”，顯然的這麼多的條文，不是西周時代所能具有的。而呂刑爲李悝以後的人所依託，也不必致疑了。至於尚書中另外一篇，洪範，也是可疑的。依照本篇作者杜先生對於歲星的想法，歲星被重視，時間不可能太早，而洪範對於歲星的強調，也應當是較晚的述作。